

中正漢學研究

專輯：近世意象與文化轉型 I：
話語權力及文本流佈

二〇一二年第二期（總第二十期）

Chung Cheng Chinese Studies

Feature Articles: Modern Chinese Thought and Literature

論朱祖謀「節日詞」中的盛世追想與 尊君意識

侯 雅 文

· 抽 印 本 ·

臺灣・中正大學中國文學系

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出版

論朱祖謀「節日詞」中的盛世追想 與尊君意識^{*}

侯雅文^{**}

摘 要

文人於節日發言吟詠，由來已久，或為鼓吹承平，或宣一己情懷，大多與其所處的時代風氣、個人際遇，密切相關。晚清以來，時局大變，不惟國體、政體改革的聲浪呼求甚熾，還有西方文明近逼，漢族傳統文化面臨絕續存亡的燃眉之急。值此處境，有些信守傳統的清代高階文官於詩詞中，抒發一己世變之感，如曾任禮部侍郎、吏部侍郎，晚年高居詞壇盟主的朱祖謀（1857-1931），其詞稿《彊村語業》，多見家國之思，尤其以「節日」為題的詞作，更屢屢書寫歷史上的盛世節慶以及明君恩澤。對照這類詞作撰成的年代，多屬於清室危亡，民權與君權爭辯激烈之時，則朱祖謀此一書寫所蘊涵的政治意義，值得關注。從中或可見他以漢族「尊君」的傳統為前提，接納、響應彼時「君主立憲」說的「尊君」主張，由此展現「中體西用」的時代思維。

朱祖謀每於詞中，擷取、重組與節日相關的歷代君臣故事，以資詠嘆，這是一種帶有特定訴求的追想，藉此喚起其他眾多文人的記憶中，漢族文化所肯認的君主政治理想。據此，本文的論題有二：一、闡明朱祖謀的「節日詞」中所表述的「盛世」與「尊君」。二、闡明朱祖謀的「節日詞」在「君主立憲」的政治思潮中，如何表現「中體西用」的意義。

關鍵詞：朱祖謀、節日、盛世、君主立憲、中體西用

^{*} 本文承蒙行政院國家科學委員會專題研究計畫補助【96-2411-H-004-030-MY2】完成，特予致謝。

^{**} 臺灣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副教授。

一、論點的提出

（一）朱祖謀詞學研究的新論題

現今學界對中國近現代（1840-1949）政治思想沿革的討論，大多以彼時文人於報刊雜誌或專著上所發表的「論文」或新文學為主要論據。而著重闡發、評價這些史料所表述的國家觀念、主權歸屬之爭辯、對立與融通，以及伴隨而生的新文化運動，藉此建構中國政治思想「現代化」的發展進程。如梁啟超《飲冰室文集》、《甲寅》之類的政論性期刊，皆為學界所資取論證的代表性史料。

在此一研究視域下，頗能曲盡當時擅於觀念理論、邏輯言辯的文人，以散文之體，所宣傳、遊說的西方國體、政體與相應的政治理念，以及在這種思維下，對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進行的改造。然相對較為忽略彼時那些供職朝廷的高階文官，如何運用古典詩詞這類文體所本具的「感發」性質，進行創作，以表達特定的政治信念；藉此喚起、凝聚同樣文化背景的知識分子，對漢族傳統政治理想的共識與擁護，並以此為前提，接納、響應「君主立憲」的時代風潮。故這類詩詞創作於近代中國政治思想的發展進程而言，亦應有其作用。本文基於此一學術史的反思，以晚清民初朱祖謀的「節日詞」為優先研究對象，嘗試對上揭學界較少關注的論題，予以闡述。

據夏孫桐〈清故光祿大夫前禮部右侍郎朱公行狀〉所載，¹朱祖謀，浙江歸安人。於光緒壬午八年（1882）、癸未九年（1883），屢獲科舉功名肯定，「成二甲一名進士，改庶吉士」。光緒庚子二十六年（1900），清廷欲恃義和拳民以制外，朱祖謀上疏力諫不可。外兵犯天津，朱氏又上疏諫言。二疏俱忤上意，「幾獲罪，終以文學侍從之臣，未遽加譴」。和議之後，因朱氏「忠愍益著」，擢升禮部侍郎，兼署吏部侍郎。「辛亥國變，不問世事，往來湖淞之間，以遺老終矣」。民國三年甲寅（1914），朱氏赴京，²「袁世凱方為總統」，「急致書聘為高等顧問，笑却之，未與通一字」。民國十四年乙丑（1925），於天津謁見溥儀。據潘飛聲〈滬社詞選序〉、³龍沐勛〈彊村晚歲詞稿跋〉所載，⁴民國二十年辛未（1931）秋天，滬社成立。夏敬觀、葉恭綽等人奉朱祖謀為「詞壇耆宿」，「共推先生為盟主」。同年朱氏病逝於上海寄廬。陳三立〈清故光祿大夫禮部右侍郎朱公墓誌銘〉曰：「進為國直

¹ 〔清〕朱孝臧著，夏敬觀評點：《彊村叢書附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附錄，頁8683-8715。

² 朱祖謀赴京之年，上文〈行狀〉誤認乙卯，白敦仁於《彊村語業箋注》已辨解，見〔清〕朱孝臧著，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2），頁264。下文出處同此書者，但於內文標註卷數、頁數，不再附註。

³ 〔清〕潘飛聲：〈滬社詞選序〉，《詞學季刊》第1卷第4號（1934），（上海：上海書店，1985），頁185-186。

⁴ 龍沐勛：〈彊村晚歲詞稿跋〉，《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頁518-520。

臣，退為世詞宗」，⁵頗能論定朱氏於政治、文學二方面的地位及成就。

晚清政局危殆，終至覆亡，朱祖謀親身經歷，所感所思，一皆於詩詞發之。四十歲之後，他專力填詞，對時局的感受，格外寄託其中。他的詞作於生前屢有刊刻，然以晚年手定的《彊村語業》，⁶最為自得。其他《彊村詞牘稿》二卷、《彊村集外詞》，據龍沐勛〈彊村詞牘稿跋〉所述「在先生固不欲其流傳」，⁷可知二集乃後人求全之刊，非朱氏注意所在。故本文以《彊村語業》中所存見的「節日詞」為主要研究的對象，而以今人白敦仁的箋注本為據。

綜觀《彊村語業》中，於「詞題」或「詞序」之處，明確標示「節日」者，約計三十六首，見「附錄」，大多為傳統節令之日。尤其自光緒三十三年丁未（1907）到民國二十年辛未（1931），他所填寫的「節日詞」，計有二十三首，內容多用君臣恩遇、恩寵（含后妃）或可顯君王威儀的過節故事；並非僅作一般民俗節慶描述。例如同樣詠「重陽」，朱氏〈鷓鴣天〉「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卷1，16），撰成於光緒二十四年，為哀悼戊戌六君子之一的劉光第而作。詞中所描述的「紅萸白菊」可見節日的事物，僅顯一般民俗之意。相較於此，光緒三十三年之後，朱氏詠「重陽」的詞作，提及「茱萸」，則凸顯恩賜的意義，後文詳述。又如詠「元宵」，朱氏〈六醜〉「甲辰元夕，舟泊端州，郭外水燈喧闐，嗑然其為春矣」（卷1，129-130），作於光緒三十年（1904），係抒發佳節當前，知交零落，時局動盪，無人可訴的感慨，詞中所描述的「鬧蛾歡會」、「六黿咫尺」、「魚龍曼衍」，乃是慶祝元宵的一般節日活動。相較於此，自光緒三十三年之後，朱氏詠「元宵」的詞作，固然也流露了家國之感，然而用以寄託情懷的題材，除了燈火盛景之外，還不止一次引用了「傳柑」這類專行於君臣之間的恩賞故事。又如詠「清明」，朱氏〈摸魚子〉「清明雨夜，泊英德，寄弟閏生」（卷1，146-147），作於光緒三十年，乃抒發清明時節，身處他鄉，思念兄弟之情，詞中所述「禁火年光」，固然源自介之推的故事，但此事僅見君王紀念忠臣之義，無涉恩遇，故在詞中只作為點明節候的民俗活動。相較於此，自光緒三十三年之後，朱氏詠「清明」的詞作，數次提及「恩賜新火」的故事。

自光緒三十三年至民國二十年，這段時期正是近代中國政治變化最為劇烈之際，則朱祖謀此一書寫節日君臣恩遇、恩寵的行為，以及由此抒發家國興亡的感懷，別具時代意義。然而，由於論文的篇幅有限，故本文優先擇取若干可為示例的詞作，以揭明、闡釋朱氏於上揭時期書寫節日的特別趨向及意義；暫不對朱氏所有「節日詞」，一一詳論。朱氏

⁵ 同註1，頁8722。

⁶ 龍沐勛：〈彊村語業跋〉云：「右《彊村語業》三卷，前二卷為先生所自刻，而卷三則先生卒後據手稿寫定補刊者也」。則卷三雖為朱氏卒後所刊，然於朱氏生前已經手寫選定，故仍有自得之意。龍沐勛：〈彊村語業跋〉，見《詞學季刊》創刊號（1933），同註3，頁206。

⁷ 龍沐勛：〈彊村詞牘稿跋〉，同註1，頁8581-8583。

於節日詞中所書寫君臣恩遇、恩寵、君王威儀的故事，一方面取合乎正道者，另一方面也取失道者，故本文所擇取的詞例，兼涵這二方面。同時也擇取該時期朱氏若干雖未明顯書寫君臣恩遇，但可見家國之感的詞作，以為輔助佐證。雖然未盡朱氏全部「節日詞」，然而明顯可見君王恩遇、恩寵及威儀的詞例，已達八首，分別是〈滿路花〉二調、〈六醜〉「滬上元夕，和夢窗吳門元夕風雨韻」、〈高山流水〉「七夕用夢窗韻」、〈夜飛鵲〉「乙卯中秋」、〈戚氏〉「丁巳滬上元夕」、〈燭影搖紅〉「乙丑元旦和閨枝」、〈齊天樂〉「乙丑九日庸庵招集江樓」。相較該時期朱氏的二十三首「節日詞」而言，比例不低，可見這類書寫確有特色而值得玩味。為了說解的需要，引用詞作為證時，依各節論點，權取關鍵片斷詳析；但也兼及全詞大意，而作綜觀概述。日後將在本文的研究成果基礎之上，進一步詳析朱氏「節日詞」的總體面向。

在本文之前，對朱祖謀詞學的研究，大多集中在闡明朱氏「校勘」、「輯佚」詞集的成就，與揭明他編選詞作的意義，而少見以他的詞作為對象，由政治、文化的視域，予以專題研究。前人在論題的取向上，尤其著重從詞學觀念的角度，詮釋朱祖謀對常州詞派的繼承。朱氏的詞學，固然有繼承常派之處，可見於他的論詞詞〈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下文略作敘述；但也有他的獨到之處。如欲窮究朱氏對常派的「承」與「變」，不應忽略他的詞作實踐。本文以朱祖謀的「節日詞」為主題，所達致的結論，可做為日後全面探討朱祖謀與常派之關係的知識基礎。

（二）本文的詮釋觀點

本文以為朱祖謀於光緒三十三年到民國二十年間所填寫的「節日詞」，多用君臣恩遇、恩寵以及君王威儀的故事，這類書寫的意義，不完全出於節日寫作題材類型的沿襲而已，更可由時代政教寓託的角度，予以體會。此一觀點的提出，基於二項理由：其一，據晚清民初與朱祖謀交好的友人、弟子所述，朱氏「作詞刊詞」實涵有「遭遇國變」之思，如王國維〈彊村（邨）校詞圖序〉云：「先生少長於是，垂老而不得歸，遭遇國變，惟以作詞刊詞自遣」，⁸又如龍沐勛〈彊村（邨）本事詞·附記〉云：「彊村（邨）先生四十始為詞。時值朝政日非，外患日亟，左衽沈陸之懼，憂生念亂之嗟，一於倚聲發之。故先生之詞，託興深微，篇中咸有事在」。⁹其二，古來文人的「節日」書寫，往往藉著特定節慶活動的描述，以達致特定的政教作用。針對第二項理由，以下稍作闡述，以說明本文詮釋朱祖謀詞作所根據的文化基礎。

「節日」的由來及作用，溯其原大抵可分為二端：其一以特定的時日，標誌節氣時

⁸ 〔清〕王國維：〈彊村（邨）校詞圖序〉，同註1，「附錄」，頁8736。

⁹ 龍沐勛：〈彊村（邨）本事詞〉，《詞學季刊》第1卷第3號（1933），同註3，頁75。

令的遞轉變換，俾使人們的日常生活作息，有所依準。如宋代陳元靚《歲時廣記》引《玉泉記》所載：「立春之日，取宜陽金門竹為管，河內葭草為灰，以候陽氣」，¹⁰可知「立春」乃標誌「陽氣」初升之時，故人們取「竹」為管，以「葭草」為灰，就是順應自然之理，而從事相關的節令活動。其二係為了彰明某種政教理念，或其他宗教教義而設。在第二種情形下，或是人為地規制某一時日，以資紀念，而未必與節令有關。如據南朝梁宗懷《荊楚歲時記》所載，農曆二月八日，是「釋氏下生之日，迦文成道之時」，信眾須「守八關之戒」，此一節日及活動，即本佛典《阿那含經》的教義訓示而來。¹¹或是雖仍然依循「歲時節令」的習俗，但往往由特定的文化價值去認知、形塑原有節日活動的意義；甚至，另外規創新的節令活動。

如以「立春」為例，東漢王充《論衡·亂龍》曰：「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耨；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順氣應時，示率下也」，¹²即指出古代「立春」之日，百姓從事農務，本是順應時氣的自然之舉。而後，在上位者以「順應天時」做為施政的理想，為了體踐之，故藉著率領百官「東耕」、「為土象人」、「立土牛」等儀式活動，以「示率下」，為民模範。此時節日活動所表徵的「順應天時」、「示率下」，已不完全出於和自然規律冥合的生命經驗；而是出於特定政教理念自覺的建構。

又以「上巳」為例，舊習為「祓禊臨水」、「羽觴隨波」。據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所載，晉武帝曾問摯虞「三日曲水」之義。¹³摯虞回答漢人徐肇於是日亡女三人，村民怪之，故攜酒水邊，「洗滌去災」，復「因水流以泛觴」。武帝對摯虞的解說並不滿意，曰：「若如所說，便非嘉節」。蓋摯虞的說解，以民間好奇尚怪的流俗解釋「節日」習俗的由來，不為武帝所認可。束皙另作他解，將「上巳羽觴」之習，溯源「周公卜洛邑，因流水以泛酒」，以及秦昭王河曲置酒，有金人捧劍預示稱霸之兆。武帝聞言，「善之，賜金五十斤」。束皙的說解，雖未回歸節氣之理，然而他的說法能獲得武帝的接受、認同，就在於從帝王功業的政治理念，去形塑上巳節日的意義。

甚者，如唐代韓鄂《歲時紀麗》引唐代李邕《金谷園記》所載：「（漢）武帝常以正月殺梟為羹，以賜群臣，食之，云：『使天下之人，知殺絕其惡類者也』」，¹⁴則武帝於年節之際，賜宴梟羹，本非正月過節原有習俗，而是別出心裁之舉，藉此傳達除惡務盡的政治理念。這便是在特定政治理念的持守下，規創了新的節令活動。

根據上述，若節日活動屬於歲時習俗，而為日常生活作息的一部分，那麼整個社會不分階

¹⁰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歲時習俗資料彙編》，道光六安晁氏本活字排印學海類編本景印，1970），卷8，頁237。

¹¹ [南朝梁]宗懷著，杜公瞻注，王毓榮校訂：《荊楚歲時記》（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頁99-100。

¹² [漢]王充著，袁華忠、方家常譯注：《論衡》（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7），卷16，頁1114。

¹³ [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古今逸史》，1966）。

¹⁴ [唐]韓鄂：《歲時紀麗》，同註10，卷1，頁18。

級、群體，皆共同從事之。若節日活動，係由特定文化理念建構而來，則往往由某些特定的群體所操持。後者如每逢節日，國君依例「賜筵」、「賞賜」百官。這便是基於特定政教理念建構的結果，歷代文獻記錄多矣。如宋代龐元英《文昌雜錄》云：「唐制，立春日，賜三省官綵勝，各有差，謝於紫宸殿門」，¹⁵宋代孟元老《東京夢華錄》於「立春」條下亦云：「春日宰執親王百官皆賜金銀幡勝」，¹⁶歐陽修《歸田錄》亦載：「國朝之制，歲時賜宴多矣。自兩制（按：內制與外制合稱，指翰林學士和中書舍人）已上皆與，惟上元一夕，祇賜中書、樞密院」等等，¹⁷可見一斑。

這類「賜筵」、「賞賜」之舉，乃源自「示慈惠」、「君臣恩遇」、「君臣相樂」的政教美意而設置。如唐玄宗曾稱說端午節宴請群臣之舉，是「歎節氣之循環，美君臣之相樂」，¹⁸蓋透過筵席「勸侑」的厚意，最容易體現君主施惠禮遇臣下，臣下知恩圖報，「相與無間」的理想。故清代秦蕙田《五禮通考》引《宋史·禮志》云：「宴饗之設，所以訓恭儉，示慈惠也」，¹⁹宋代王明清《揮塵錄·餘話》載錄宋代蔡京（字元長）〈太清樓侍燕記〉亦云：「〈鹿鳴〉之什，冠於〈小雅〉，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既醉太平之時，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在昔君臣施報之道，在於飲食燕樂之間」、「實君臣千載之遇」。²⁰文中更將「賜筵」、「賞賜」所涵有的政教理念，上溯「經典」，以為依據。以下則轉入探討文人書寫「節日」的行為意義。

在中國文學史上，以節日為題而吟詠創作者，由來已久。其書寫的內容之一在於記述節慶宴樂的承平氣象。故宋代張炎《詞源》卷下〈節序〉便云：「見時序風物之盛，人家宴樂之同」。²¹據此，「節日」所表徵的意義之一，就在於「盛世」與「同樂」。然而，古代文人雖然同寫「盛世」、「同樂」的節日經驗，但因不同的言說立場，此即語境，則所表述的意義便不相同。

如情況一，文人所書寫的「節日」活動，僅止於和親友之間私人往來交遊的經驗，或作「當下情事」的描述，或作「往事」的追憶，則這類書寫「節日」的行為意義，就偏向於抒發親友聚散之情或是個人生命意義的內省。例如唐代王維撰〈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²²就是在重陽時，因作客他鄉，故興起思親之情。宋代朱熹撰〈九日登天湖以菊花

¹⁵〔宋〕龐元英：《文昌雜錄》，《百部叢書集成·學津討原》（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卷3。

¹⁶〔宋〕孟元老著，鄧之誠註：《東京夢華錄注》（臺北：世界書局，1988），卷6，頁171。

¹⁷〔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歸田錄》（臺北：世界書局，1991），下冊，卷2，頁1027。

¹⁸〔唐〕唐玄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並序〉，〔清〕彭定求等奉勅編著，王全點校：《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卷3，頁28。

¹⁹〔清〕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經部禮類，卷160，頁32。

²⁰〔宋〕王明清：《揮塵錄·餘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1981），卷1，頁174。

²¹〔宋〕張炎著，蔡桢疏證：《詞源疏證》（北京：中國書店，1985），卷下，頁41。

²²〔唐〕王維著，陳鐵民譯注：《新譯王維詩文集》（臺北：三民書局，2009），頁4-5。

須插滿頭歸分韻賦詩得歸字》，²³便書寫他個人重陽過節的今昔對比，由此省思人生的隱顯起伏。

情況二，文人以公眾或特定群體所操持的「節日」活動為題材，進行書寫。但因言說立場不同，則其所具有的意義便不相同。如某些宦遊文人，對於一地民間節日風俗的記錄，可能出於治理地方或修纂志書的需要。如清代張實居〈赤嵌集序〉稱清代孫元衡《赤嵌集》所以「詠風俗」，即「意在移易」。²⁴此外，尚有為數眾多的作品，係書寫君臣節日「賜筵」、「賞賜」的活動。這類活動實本「恩遇」的政教理念而來，已如上述。是故，倘若這類書寫所敘述的節慶活動，係出於太平之時，文人「應制」而作的當下經驗，那麼通常指向國君，意在表達謝恩、頌美盛世。如唐代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即抒發了「除夕」之時，「王孫」向「帝子」謝恩、祝壽之意。²⁵然而，倘若在世變的處境下，文人還進行這類書寫，那麼，往往意在藉用昔日之「盛」、之「樂」，來對照今日之「衰」、之「哀」，以此指向社會群體，感發他們的特定政教理念，當中可能涵有緬懷往昔盛世君恩，並寄託期待、規勉時人之意。這種對往日盛世節慶的追想，是一種指向社會群體的感化行為。

因此，文人所以在作品中聯想歷史上的節慶故事，並非充作故實考聞，以炫博學；而往往是基於特殊情感的驅動或理念的省思，所形成的意向性行為。這類本具特定政教理念的「節日故事」，經過不同時期文人的轉述、接受、批評、認同之後，就概化成為一個個片斷的事件，用以表徵某種群體價值或觀念的「符號」，可供作者編造、重組，以傳達特定的理念，回應自身所面對的存在問題。據此，縱使文人於作品內所書寫的節日活動，歷代可見，然而因為他處在世變的時代，有特別的身世遭遇，就形成特別的「語境」，而賦予所敘述的節日故事，以時代新意。是故，在詮釋解讀這類作品時，不能滿足於描述作者敘述的節日活動，內容為何，還要進一步考察其言說時，所對應的時代身世遭遇，與所接受認同的文化傳統，如此方能深刻闡明這類書寫行為的總體意義。

此外，文人於書寫時，因擇定的「文體」不同，對感發讀者的志意來說，作用便不相同。以「散文」之體書寫者，對節日活動的內容及所具的政教理念，多作直接敘述，其作用在於道理訓示；而以「詩歌」之體書寫者，往往取擇節日活動的關鍵情節，予以描述，至於所欲引發的政教理念，則隱於言外，讓具有同樣文化涵養的讀者，由作品的意象自然興感，故其作用在於情意的感發。

本文就是參照上述古代「節日」的政教作用與相關文學創作的關聯模式，和時人對

²³ 〔宋〕朱熹著，李光地、熊賜履奉勅編：《御纂朱子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同註19，卷66，頁57-58。

²⁴ 〔清〕孫元衡詩若干詠節日，如〈守歲，分樂字，賦得歲熟鴉聲樂〉、〈除夕雷雨大作〉、〈端午〉等，可見臺灣風俗。〔清〕張實居序文見孫元衡：《赤嵌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4），頁3。

²⁵ 〔唐〕杜審言：〈守歲侍宴應制〉，《全唐詩》，同註18，卷66，頁736-737。

朱祖謀填詞動機的指示，形成了詮釋朱祖謀「節日詞」之意義的觀點，並且在這項觀點下，取用合適的詞例，以資印證。是故，朱祖謀的「節日詞」，固然不免個人往事的追想，例如〈華胥引〉「重午感舊」(卷2, 230-231)，據白敦仁箋注繫年，撰成於宣統元年己酉(1909)。該詞因端午時節，「追悼」中丞陳伯平而作(卷2, 228-231)。內容所述景物情事多見哀淒，唯「牆角雙榴，褪紅還上裙褶」二句，化用宋代吳文英〈澡蘭香〉「淮安重午」上片：「為當時、曾寫榴裙，傷心紅綃褪萼」，²⁶及南朝齊沈約《宋書·羊欣傳》所載王獻之「書裙數幅」之意，²⁷略見追憶過去與陳伯平在酒宴中以文藝相賞的樂事。此一追想，較顯知音不在的個人傷感。除此之外，朱祖謀於多首詞作中，皆援引歷代「君臣恩遇」的過節故事，以抒發節日的感思，這類君臣節日故事所涉活動，多本諸政教理念的建構而來，不全是順應節氣自然形成的民俗活動。故此一書寫行為，另涵有指向時人、時局的社會教化意義。本文便是根據這類詞作內容，考察他的政治理念。至於其他「節日詞」中，若未顯歷代君臣家國之意，就暫時不予討論。

據滬社社員謝榆孫(掄元)追記，朱祖謀曾自述〈鷓鴣天〉「廣元裕之宮體」的「本事」，為諷袁世凱稱帝事而作。²⁸然張爾田〈與龍榆生論彊邨詞事書〉曾駁此說為非，另改正為宣統出宮之變。²⁹可見朱氏的詞作有時難以確指為何事而寫。嗣後，因夏承燾的敦促，龍沐勛也「因先就所聞於先生(指朱祖謀)」，涉及詞中本事者，草成〈彊邨本事詞〉若干則，見〈彊村(邨)本事詞·附記〉。³⁰至白敦仁箋注本，則博搜典籍，逐首考察詞中本事所在，鉤稽甚詳。然據龍沐勛〈附記〉所述：「以詞中本事，叩諸先生，先生多不肯言。一日執卷請益，先生就其大者有所指示，予因從而筆記之。然欲叩其詳，亦堅不肯吐」。³¹

朱祖謀所以不肯吐露詞中本事細節，可能的原因之一，在於他的詞觀。他曾在〈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首之十三首推崇清代周濟云：「金鍼度，詞辨止庵精」(卷3, 356)，第十九首評清代莊棫(中白)、譚獻(復堂)云：「妙不著言詮」(卷3, 367)，據此可以推想朱氏填詞，雖始於「有寄託而入」，終欲「無寄託出」，以令讀者「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如此，方符應於周濟的寄託說。³²由此亦可見朱氏對常派繼承的面

²⁶ [宋]吳文英著，吳蓀箋校：《夢窗詞彙校箋釋集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頁391。

²⁷ [南朝齊]沈約：《宋書》(臺北：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四部備要》，1982)，列傳第22卷，頁1。

²⁸ [清]謝榆孫：〈記彊邨先生廣元裕之宮體鷓鴣天詞本事(一)〉，收錄於龍榆生：〈忍寒廬零拾〉(六)，《詞學季刊》第1卷第3號(1933)，同註3，頁184。

²⁹ [清]張爾田：〈與龍榆生論彊邨詞事書〉，《詞學季刊》第1卷第4號，同前註，「通訊」，頁191。

³⁰ 同註9。

³¹ 同前註。

³² 上二段引文，見[清]周濟：《介存齋論詞雜著》，頁2，附刻於周濟著，[清]譚獻評：《詞辨》(臺北：廣文書局，1999)。另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云：「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亦可

向，至於此一「節日詞」的書寫，如何體現常派的「詞史觀」，又趨近常派何人的「詞史觀」，日後再專題研究。

前述白敦仁的箋注本對朱祖謀的詞作，逐首考察比附特定的政教事件，大多出於一己所得，未必符合朱氏的原意及詞觀。既然朱氏填詞的「本事」不可盡知，因此本文對朱祖謀的詞作，僅作情志、理念的闡發，並由讀者意會的立場，參酌這類書寫所在的時代總體政治氛圍，以及朱氏在該時期的政教作為，合理地詮釋它可能發揮的政治、文化作用。不再如白敦仁箋注一般，就作品內的個別意象一一指實、考辨、附會特定的政治人事。以下展開第一項論題。

二、朱祖謀「節日詞」的「盛世追想」及其「心理動因」

（一）如何追想盛世

1、聯想同情共感的古人，以抒發「傷愁」的過節心境，藉此起興

朱氏的「節日詞」往往由當下時局、際遇的失落感，聯想起相同或近似此情懷的古人，從而呼應他們的作品語境，以抒發「傷」、「愁」、「退隱」、「孤寂」的過節心境，並興起昔日盛世的追想，故作品流露出濃厚的歷史感。本節先就「傷愁」的過節心境，予以論述，至於昔日盛世追想的內容，留待下一小節析論。可供討論者，如〈六醜〉「滬上元夕，和夢窗吳門元夕風雨韻」，全詞如下：

漸梅英墮粉，翠幄暖、花風新掣。翦淞半江，春綃冰暈滅。密逗芳節。細漏丁東際，繡幡雙影，近寶臺高揭。蕃街走馬嘶塵熱。霧絡消香，波簾卷纈。沈沈釀寒城闕，被瓊簫成陣，迤邐吹徹。吟悰漸歇，況侵年苧髮。記起傳柑事、情味別。春芳又遲鳴舫。濺行雲倦趁，曲坊巾襪。銀荷燼、鬧蛾飛絕。不堪是、擲徧金錢換了，舊時明月。歌塵定、猶旋迴雪。聽笑語、凝白闌干外，清鉛暗結。（卷2，212）

詞人在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以病乞解廣東學政一職，後出任江蘇法政學堂監督，詞作於此任上。「和夢窗吳門元夕風雨韻」，正指明他在本年上海度過元宵節時，聯想起南宋吳文英及其詞〈六醜〉「壬寅歲吳門元夕風雨」。吳詞如下：

呼應，見周濟：《宋四家詞選》（臺北：廣文書局，1999），頁1。

漸新鵝映柳，茂苑鎖、東風初掣。館娃舊遊，羅襦香未減。玉夜花節。記向留連處，看街臨晚，放小簾低揭。星河激灩春雲熱。笑靨欹梅，仙衣舞纈。澄澄素娥宮闕。醉西樓十二，銅漏催徹。紅消翠歇，歎霜簪綠髮。過眼年光舊、情盡別。（按：或斷句「過眼年光，舊情盡別」）泥深厭聽啼鴂。恨愁霏潤沁，陌頭塵襪。青鸞杳、鈿車音絕。卻因甚、不把歡期，付與少年華月。殘梅瘦、飛趁風雪。向夜永、更說長安夢，燈花正結。³³

「壬寅」指宋理宗淳祐二年（1242），當時吳文英客居蘇州，在風雨交加的元宵夜，獨自嘆老傷逝，懷想昔日吳門、京城，晴夜燈節熱鬧的景象。清末以來，多認定吳文英詞隱涵「黍離麥秀之傷」、「感觸時事」，³⁴不獨為個人情事。據此，同樣的氣候、相近的地點與一樣客居憂國的處境，使得朱祖謀追和吳文英，填了這首詞作，而於下片抒發了「傷愁」的過節心境。

該詞過片「吟悵漸歇」一句，即點出上海過節的氣氛逐年冷落，又兼今夕風雨，美好的春天似乎因此提早離開，故續曰：「春芳又遲鳴鴂」（反襯鴂的鳴聲來晚了）。此一句意，呼應了吳文英詞中「泥深厭聽啼鴂」。固然，風雨使得花燈難以燦爛，徒留餘燼，青春仕女閉戶不出，令人掃興，但最難堪的，恐怕是勉強取樂之後，被回憶的感傷所淹沒的痛苦，故詞曰：「銀荷燼、鬧蛾飛絕。不堪是、擲偏金錢換了，舊時明月」。這一段句意，呼應吳文英詞中「青鸞杳、鈿車音絕。卻因甚、不把歡期，付與少年華月」。這種傷逝的悲情，不純然因個人的生命變故而起，更與家國的興亡密不可分，很難向不知國恨者傾訴，只能獨自吞泣。故結曰：「聽笑語、凝白闌干外，清鉛暗結」。這一段句意，呼應吳文英詞中「向夜永、更說長安夢，燈花正結」。「長安」於此可代指宋朝或泛稱歷代的京城。「夢」則指既往而不復存在的繁華，意涉亡國。基於上述，可見朱祖謀不僅寫一己的過節感受，更將筆端朝向與家國有關的群體歷史經驗。

又如〈滿路花〉「清明再和簡叔問」，全詞如下：

闌枝過筆低，鳥跡書苔破。泉香霏杏粥、催新火。花慳酒殢，一繭愁絲裏。亂疊書圍坐。薄午簾陰，病懷惟稱頽臥。紅芳無主，歡計年年左。春湍流白日、誰關鎖。江湖滿地，夢引樵風過。野鷗慵勝我。一棹相尋，世外應有人呵。（卷

³³ 同註26，頁763-764。

³⁴ 〔清〕況周頤：〈歷代兩浙詞人小傳序〉云：「夢翁……乃丁世劇變，戢影滄州，黍離麥秀之傷，以視南渡群公，殆又甚焉」，文見〔清〕周慶雲編，方田點校：《歷代兩浙詞人小傳》（杭州：浙江出版聯合集團、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清〕鄭文焯：〈致朱祖謀書〉云：「即夢窗亦感觸時事，不盡自組麗中來」，文見鄭文焯著，孫克強、楊傳慶輯校：《大鶴山人詞話》（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卷2「論詞書」，第73則，頁289。

2, 191)

詞作於光緒三十三年。上片可見愁懷沈重，雖然時至清明，欄杆旁的花木、庭院的雀鳥，都感應時氣，而表現生機；但詞人卻懶臥書房，賞花不能，復因酒而疲乏，神氣蕭索，故曰「花慳酒滯，一繭愁絲裏」、「病懷惟稱頹臥」。又因此「愁」為政教而發，故於下片引杜甫詩懷，以喻己志，其曰：「江湖滿地，夢引樵風過」，這二句詩乃化用〈秋興八首〉之七而來，見後文論析。

又如〈夜飛鵲〉「乙卯中秋」亦見此筆法，全詞如下：

金波暖斜漢，流照屏山。樺燭冷散青煙。珠簾欲上美人去，誰家今夜今年。當窗亂雲霧，恣霓裳狂舞，換譜鈞天。（或作「恣霓裳狂舞換譜鈞天」，不合律）乘風汗漫，問瓊樓、何似人間。多事桂宮仙斧，七寶尚凌虛，裝綴嬋娟。闌外秋香泣露，移檠清淚，消盡金仙。廣寒殿闕，怕常娥、不許流連。共孤光誰與，不成把盞（琰），北望淒然。（卷2，271-272）

詞作於民國四年，下片曰：「闌外秋香泣露，移檠清淚，消盡金仙」、「共孤光誰與，不成把盞，北望淒然」。前一段文句化用唐代李賀〈金銅仙人辭漢歌〉，³⁵後一段文句化用宋代蘇軾〈西江月〉「黃州中秋」（世事一場大夢）。³⁶李賀此詩曾云：「憶君清淚如鉛水」，該詩乃藉著魏明帝遷徙金銅仙人的史事，抒發帝王功業難以長久的感慨。之後被歷代遭受亡國之痛的文人反覆援引，便成為表徵「故國之思」的符號。如南宋末王沂孫〈齊天樂〉「蟬」（一襟餘恨宮魂斷）下片所云：「銅仙鉛淚似洗」，就是取李賀詩中所表徵的語意，來抒發南宋覆亡的「家國之恨」。周濟《宋四家詞選》釋王沂孫此詞時，已指出此意。³⁷至於蘇軾〈西江月〉一詞，下片結云：「中秋誰與共孤光。把盞淒然北望」，此乃東坡雖遭貶謫在外，猶思君不已，可見忠心。回到朱祖謀的詞，他所以湊合李賀、蘇軾之作，並非為了客觀記載他二人作品存在的事實，而是藉由重組、改寫這類已成歷史的文學作品，抒發清朝遺老遠離京城，心中懷抱亡國、思君的悲慨。

又如〈燭影搖紅〉「乙丑元旦和閨枝」，全詞如下：

³⁵ 〔唐〕李賀著，王友勝、李德輝校注：《李賀集》（長沙：岳麓書社，2003），卷2，頁91。

³⁶ 〔宋〕蘇軾著，朱祖謀編年，龍沐勛箋：《東坡樂府箋》（臺北：華正書局，1990），卷1，頁121。朱氏於詞下注曰：「王（王文誥）案：庚申（元豐三年）八月十五日作」、「《漁隱叢話》……東坡在黃州，中秋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今人對此詞寫作時間地點另有紹聖4年儋州之說，見蘇軾著，鄒同慶、王宗堂校注：《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798-799。

³⁷ 〔清〕周濟評說〔宋〕王沂孫〈齊天樂〉「蟬」（一襟餘恨宮魂斷）云：「此家國之恨」。見《宋四家詞選》，同註32，頁26。

野哭千家，閉門不恨春光淺。年時仙仗簇朝正，瞻座香飄殿，投老滄江臥晚。怕安排、黏鷄畫燕。盡情燈火，多事屠蘇，今朝心眼。留命何年，飾巾那計流光換。夢魂猶自點朝班，誰道長安遠。再拜鶉聲咽斷。倚危闌、飄風鬢短。為誰消息，爆竹東鄰，青旂孤顫。(卷3，311)

詞作於民國十四年。據白敦仁的箋注，同年三月，朱祖謀才「謁天津行在」。詞中亦援引杜甫，以抒發「退隱」、「傷愁」的意緒，故曰「投老滄江臥晚」、「夢魂猶自點朝班，誰道長安遠」。這二句另見後文詳論。所謂「野哭千家」，化用杜甫〈閣夜〉，³⁸意指對民生時事的關心，而後云「閉門不恨春光淺」，卻終以遺世自處，兩相對照，以見詞人心境今昔的變化。今朝時局變故，詞人閉門退隱，不忍祈福苟安，故曰「怕安排、黏鷄畫燕」，對徹夜不寐，與家人團聚共飲屠蘇，也毫無意緒。故曰「盡情燈火，多事屠蘇」。

又如〈齊天樂〉「乙丑九日庸庵招集江樓」，全詞如下：

年年消受新亭淚，江山太無才思。戍火空邨，軍笳壞堞，多難登臨何地。霜飄四起。帶驚雁聲聲，半含兵氣。老慣悲秋，一尊相屬總無味。登樓誰分信美。未歸湖海客，離合能幾。明日黃花，清晨白髮，飄渺蒼波人事。茱萸舊賜。望西北浮雲，夢迷醒醉。並影危闌，不辭輕命倚。(卷3，388-389)

詞作於民國十四年，詞人心中充滿國難之痛，故聯想起《世說新語·言語》所載新亭對泣的故事。³⁹面對江山，不復從容吟詠的詩興。又民國以來，內戰頻仍，列強進逼，局勢紛擾，人人自危，所謂「戍火空邨，軍笳壞堞，多難登臨何地」、「驚雁聲聲，半含兵氣」俱見此意。遭逢戰亂，飄泊他鄉，雖然重陽到來，卻無緣歸家，遲暮之年，前途未卜，對此情景，詞人不禁湧生無限鄉愁。詞中所謂「登樓誰分信美」、「望西北浮雲」，前者反用王粲避亂客居荊州，登當陽城所作的〈登樓賦〉：「雖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抒發不管異地或故鄉都遍地戰火，難以比較何地為美，棲身無處之悲，視王粲更進一層。⁴⁰後者化用曹丕為遊子征夫苦於時亂，流離他鄉的鬱悶而作的〈雜詩〉二首之二：「西北有浮雲」，⁴¹藉此表達詞人自己進退危懼的心情。

³⁸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2009），卷18，頁1561。

³⁹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1988），頁71。

⁴⁰ 〔魏〕王粲著，吳雲、唐紹忠校注：《王粲集校注》，收錄於吳雲主編：《建安七子集校注（修訂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卷3，頁307。

⁴¹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魏詩》（北京：中華書局，1995），頁401。

2、追想歷史上帝京、帝王的節日活動，義涉褒貶

本節主要闡述朱祖謀於「節日詞」中對歷史上京城盛世的追想。如〈戚氏〉「丁巳滬上元夕」，全詞如下：

月明中，人間無主是東風。火合銀花，倚交琪樹，錦成叢。瓏璁，好簾櫳，歌鶯舞燕惜息息（匆匆）。滄江倦客吟晚，際此三五幾心同。市暖蛾鬧，林暄鴉起，蒨霞倒影仙蓬。算金錢換得，流水宵短，撲地春空。回首帝里遊棕。鼇駕鳳吹，迤邐趁青驄。瑤臺路、翠嬌紅嫵，管疊絲重。萬芙蓉。紺蕊鏡裏衣香，尺咫步綺西東。歲華轉燭，悄拍闌干，把盞北望朦朧。未是閒情緒，催霓唱徹，作弄春工。問取孀娥見否，便臨花、對酒恁忡忡。年時笑語傳柑，醉沾鎬宴，一餉華胥夢。費念奴、憔悴清歌送。終古恨、縈損渠儂。牘夜窗、寸蠟衰紅。念芳節、□（袖）濕淚龍鍾。甚春寒重，蕃街畫鼓，曼衍魚龍。（卷2，278-279）

詞作於民國六年，分三段。首段寫上海元宵燈夜繁華熱鬧，如「火合銀花，倚交琪樹，錦成叢」。但詞人無心行樂，「滄江倦客吟晚」一句，語出杜甫〈秋興八首〉之五：「一臥滄江驚歲晚」，⁴²取其遠離京城，心繫國事之悲，表白一己過節的心境。次段「回首」二字，可見追想。自「回首帝里遊棕」到「尺咫步綺西東」，到第三段「年時笑語傳柑，醉沾鎬宴」，這二段所描述京城觀燈、賞樂、錦繡天街、傳柑、賜宴的盛況，不限於清代，實為各代所有。例如宋代張耒〈上元日思京輦舊遊〉三首之二：「信馬恣穿深柳巷」、⁴³宋代韓淪〈探春令〉「景龍燈」：「景龍燈火昇平世。動長安歌吹」、⁴⁴宋代曹勣〈東風第一枝〉「元夕」：「真箇樂、聖駕游幸。四部簫韶，羣仙奏樂，萬光耀境」、⁴⁵宋代吳億〈燭影搖紅〉「上晁共道」：「誰識鼇頭，去年曾侍傳柑宴。至今衣袖帶天香，行處氤氳滿」、⁴⁶明代金幼孜（明成祖時任文淵閣大學士）五排〈元夕賜觀燈〉廿六韻：「靈鼇駕碧空」、「碧紗圍菡萏，繡幄透芙蓉」、「羅綺豔芳叢」。⁴⁷對舊時文人而言，此情此景，就是太平盛世。一如金幼孜詩首二句所頌：「聖主敷文德，朝廷戢武功」。據此，朱氏所以追想帝京節慶，便可能涵有緬懷往昔盛世太平之意。

又如〈滿路花〉「清明再和簡叔問」，由前文論述可知，詞人既以杜甫自比，杜甫時

⁴² 〔唐〕杜甫著，葉嘉瑩集說：《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頁283。

⁴³ 〔宋〕蒲積中：《歲時雜詠》，《文淵閣四庫全書》，同註19，集部總集，卷8，頁15。

⁴⁴ 唐圭璋：《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83），第4冊，頁2248。

⁴⁵ 同前註，第2冊，頁1214。

⁴⁶ 同前註，頁1176。

⁴⁷ 〔明〕金幼孜：《金文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同註19，集部別集，卷3，頁25-26。

刻不忘君恩，故清明節令當前，自然容易聯想起與君恩有關的活動，如上片所述「泉香霏杏粥、催新火」，「催」意指逼近，可指由品嘗杏粥感知昔日恩賜新火的時刻近在眼前。蓋古來頻見皇室於清明之時，令「尚食（內膳習）內園官小兒（供奉禁苑的僕役），於殿前鬪鑽新火。先進者賜絹三匹，碗一口，尋以新火賜宰臣以下」的節日活動，此事可見韋慎微《咸鎬故事》所記，⁴⁸歷代文人述及此事，多涵頌美太平之意。如宋代歐陽修〈清明賜新火〉亦有「桐華應候催佳節，榆火推恩忝侍臣」，⁴⁹便以「催」字表示恩賜新火的佳節旋至之義。

又如〈燭影搖紅〉「乙丑元日和閨枝」，承前述文意的分析，詞人閉門自傷之餘，唯剩追憶，聊可安慰。故於上片追想「年時仙仗簇朝正，瞻座香飄殿」，緬懷盛世君王曾有的威儀，此二句指向古來諸侯或臣屬在正月初始朝見天子的儀式。「瞻座」二字可見崇敬。如錢謙益〈元日雜題長句〉八首之一：「青陽玉律應三元，是日朝正會禁門」亦寫元日「朝正」之事。⁵⁰其他像〈齊天樂〉「乙丑九日庸庵招集江樓」，下片追念「茱萸舊賜」，意涉「唐制，九日賜宴及茱萸」的故事，⁵¹則所感思者，亦屬節日帝王的恩賜。

然而，如前引〈夜飛鵲〉「乙卯中秋」一詞，追想昔日帝王之事，卻語帶貶意。該詞上片云：「當窗亂雲霧，恣霓裳狂舞，換譜鈞天」，指唐明皇於中秋夜，隨道人遊月宮，暗記天上仙樂，返回後命樂官製作〈霓裳羽衣曲〉之事，可見於《樂府詩集》所載。⁵²楊貴妃善舞〈霓裳羽衣〉，甚得明皇寵愛，可惜二人耽溺兒女私情，罔顧國家，終招致安史之亂。歷來文人敘及此事多寓貶諷之意，如白居易〈長恨歌〉所述：「漁陽鞞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⁵³回到朱祖謀的詞，「誰家今夜今年」句中只言「誰家」，不直稱貴妃，可見《春秋》微辭褒貶的筆法。「恣」、「狂」二字顯然表露了不認可明皇放縱私情，對貴妃過度恩寵。此一評價，另可見於〈高山流水〉「七夕用夢窗韻」，全詞如下：

絳河不動九微風。數秋期、輪徧纖葱。花外玉鵝笙，黃昏韻入初鴻。閒愁在、唾碧拈紅。穿鍼伴，多少微雲院落，畫燭房櫳。浸三星細轉，滴滴露槃濃。 機

⁴⁸ 上引〔唐〕韋慎微《咸鎬故事》所記，見《施註蘇詩》轉引。蘇軾著，施元之、施宿、顧禧合註，邵長蘅、顧嗣立刪補：《注東坡先生詩》（又稱《施註蘇詩》），《文淵閣四庫全書》，同前註，集部總集，卷19，頁23，〈徐使君分新火〉詩下。又〔唐〕闕名：《輦下歲時記》，同註10，第30冊，頁1，也有相近的記載。

⁴⁹ 〔宋〕歐陽修著：《歐陽修全集·居士集》，同註17，卷13，頁96-97。

⁵⁰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牧齋初學集》卷20，《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第1冊，頁707。

⁵¹ 見〔唐〕杜甫：〈九日〉五首之二：「茱萸賜朝士」句下注。同註38，卷20，頁1765。

⁵² 《唐逸史》載玄宗遊月宮之事，見〔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中華書局，1987），第2冊，卷56，頁8，〈霓裳辭十首〉。

⁵³ 〔唐〕白居易著，謝思緯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第2冊，卷12，感傷四，頁943。

中。年年錦書恨，憑說與、翠水璇宮。容易誤良宵，夢約幾負香茸。（或作「容易誤、良宵夢約，幾負香茸」，不合律）笑雕陵、錦羽偏工。人天事，輕賺羅池倦客，酒醒清鍾。下疏簾憶斷，釵盒故情慵。（卷2，232-233）

詞作於宣統元年，用吳文英〈高山流水〉「黃鍾商。丁基仲側室善絲桐賦詠，曉達音呂，備歌舞之妙」詞韻。吳詞全文如下：

素絃一一起秋風。寫柔情、都在春葱。徽外斷腸聲，霜霄暗落驚鴻。低顰處、翦綠裁紅。仙郎伴，新製還賡舊曲，映月簾櫳。似名花並蒂，日日醉春濃。吳中。空傳有西子，應不解、換徵移宮。蘭蕙滿襟懷，唾碧總噴花茸。後堂深、想費春工。客愁重，時聽蕉寒雨碎，淚濕瓊鍾。恁風流也稱，金屋貯嬌慵。⁵⁴

這首詞是吳文英為丁有（基仲）的侍妾得趣而寫，本與節日無關。詞中極力描述得趣的音樂造詣、文才，以及如蘭蕙一般高尚的情操，更兼述她和丁有之間夫妻恩愛的情景。回到朱祖謀的詞，不似吳詞一般描述男女的歡好，反而敘寫七夕時女子不得恩愛，心生「閒愁」，閨中回憶向織女三星乞巧的往事，如上片「閒愁在」至「滴滴露繁濃」一段。下片，轉藉無數人間男女的別恨，向身處宮闕的帝王后妃勸告：歡好私情本就不易長久。可嘆的是，明知如此卻耽溺私情，終而自召災禍。此一省思，可見於「笑雕陵、錦羽偏工」。這一句固然語出《莊子·山木》：「莊周遊於雕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見利而忘其真」的哲思，⁵⁵但於詞中用意變改，指異鵲自炫其形，引來暗算，咎由自取；引申指禍福無門，唯人自召。最典型的歷史教訓即是唐玄宗與楊貴妃，因私情而罔顧應有的家國公義，自召災禍。故結曰：「下疏簾憶斷，釵盒故情慵」，「釵盒故情」，正指白居易〈長恨歌〉所云：「惟將舊物表深情，鈿合金釵寄將去。釵留一股合一扇，釵擘黃金合分鈿。但令心似金鈿堅，天上人間會相見」、「七月七日長生殿，夜半無人私語時」，⁵⁶所述明皇、貴妃的愛情。詞中著「憶斷」、「慵」二詞，表露了這類帝妃的恩寵情愛，不值得回憶的貶意。此一評斷，顯示未必認可白居易所持同情的觀點。

（二）追想的心理動因

⁵⁴ 同註26，頁384。

⁵⁵ 〔戰國〕莊周著，〔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三民書局，1993），下冊，頁695。

⁵⁶ 同註53，頁944。

雖然，朱祖謀鮮少於「節日詞」中，明白使用表述特定價值觀的語彙，宣示他所以那樣追想古人的節日活動，內心所操持的信念。然而，從這些被他所引述、改寫的古人古事，於歷代流傳的過程中，所積澱的文化價值，不難推想促使他那樣追想的心理動因。其內容大致可分為二類：1、源於「忠愛感」；2、源於「恩義感」。二者一涉臣道，一涉君道，相待而生。以下分節闡述。

1、源於「忠愛感」

前文已述朱祖謀於〈夜飛鵲〉「乙卯中秋」，聯想起蘇軾〈西江月〉詞下片結句。據宋代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九引錄楊湜《古今詞話》，就已經指明「東坡在黃州，中秋夜對月獨酌，作〈西江月〉詞……然一日不負朝廷，其懷君之心，末句可見矣」，⁵⁷已舉此詞末句做為東坡「懷君」、「忠君」的表徵。則朱氏於詞中特予援用，自然有感於此一表徵之意。又該詞上片結句「乘風汗漫，問瓊樓、何似人間」，亦化用東坡〈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作此篇，兼懷子由」上片「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一段。據《復雅歌詞》所錄，「神宗問內侍外面新行小詞，內侍錄此進呈。讀至『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上曰：『蘇軾終是愛君』」，⁵⁸由是可見，詞人藉東坡詞作，表達一己愛君、思君之情，意甚明顯。

除了蘇軾之外，朱祖謀又有多首「節日詞」聯想起杜甫。如前引〈滿路花〉「清明再和簡叔問」下片云：「江湖滿地，夢引樵風過」，意指曾於夢中，趁著順風，到杜甫晚年所寓居的夔州。這二句承杜甫〈秋興八首〉之七：「江湖滿地一漁翁」的語意。⁵⁹歷來文人解讀此詩，多見特賞此句。如錢謙益《讀杜小箋》於此句下云：「關塞鳥道，眼中之地也。江湖漁翁，眼中之人也。故國舊臣，俯仰上下，情見乎詞矣」，⁶⁰清佚名（作者名不詳）《杜詩言志》解此句云：「末二語言天下大勢，壞亂已極，憂之者惟己一人也」，⁶¹在這類說解下，此句所述意象，成為表徵杜甫「憂時忠君」的符號。朱氏於詞中所以特別聯想此句，應感於此句所表徵的「忠愛」情懷。

此一對杜甫忠君人格的認同，另可見於前引〈燭影搖紅〉「乙丑元旦和閨枝」，上片云：「投老滄江臥晚」，下片云：「夢魂猶自點朝班，誰道長安遠」，與同為乙丑年所作〈高陽臺〉「除夕閨生宅守歲」，全詞如下：

⁵⁷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廣文書局，1967），後集卷39，第8冊，頁2108。

⁵⁸ [宋]鮑陽居士：《復雅歌詞》，見唐圭璋：《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第1冊，頁59。

⁵⁹ 同註42，頁418。

⁶⁰ [清]錢謙益：《讀杜小箋》下，同註50，卷108，頁2185。

⁶¹ [清]佚名：《杜詩言志》（揚州：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79），第7冊，卷14，頁36。

藥裏關心，梅枝熨眼，年光催換天涯。綵勝迷離，忘情紅入燈花。常時風雨聯牀地，付冷吟、閒醉消他。更休提、束帶鳴鷄，列炬飛鴉。驚心七十明朝是，甚兩頭老屋，舊約長賒。醉倚屠蘇，寧知肝肺槎枒。干戈滿目悲生事，對阿連、休話無家。却因依、北斗闌干，凝望京華。（卷3，390）

〈燭影搖紅〉三句，語出前引〈秋興八首〉之五：「一臥滄江驚歲晚，幾回青瑣點朝班」。〈高陽臺〉下片末二句云：「却因依、北斗闌干，凝望京華」，則化用〈秋興八首〉之二：「每依北斗望京華」。⁶²這首詞作於民國十四年。歷來文人解讀杜甫〈秋興八首〉之五，對於上引二句多由「老臥滄江，感懷曩昔」，去詮釋其中所涵有的「戀闕之懷」。如明代張綏《杜工部詩通》、⁶³清代江孟亭輯《杜詩集說》引查慎行語。⁶⁴至清代金聖嘆《唱經堂杜詩解》，更特出「幾回青瑣點朝班」一句可見杜甫「刻刻係（繫）心朝廷，雖臥滄江，怵（恍）然（本文按：彷彿）若點朝班者」。⁶⁵回歸朱祖謀的語意，則夢中猶時時隨班列而朝謁，片刻不敢忘君，義更近於金說。至於「每依北斗望京華」一句，雖後人說解有「南斗」之疑，但歷來文人亦多由「每」字，想見杜甫「無夕不望京華」的固執。如明代顏廷渠《杜律意箋》、⁶⁶錢謙益《讀杜小箋》等俱見此意。⁶⁷回到朱祖謀詞，「凝望」指久望，與前說相近，凡此均可見，他所以聯想杜詩中的特定文句，即因認同其中所表徵的忠誠，同時藉此表白一己對清廷的心意。

另參朱祖謀辭世前，曾作〈鷓鴣天〉「辛未長至口占」（卷3，426），實為絕命詞，蓋「辛未」即指民國二十年（1931），朱氏病逝於此年。此詞雖非為節日而詠，然其上片首句便曰：「忠孝何曾盡一分」，言下雖自謙未盡忠盡孝，然而一生以「忠」自許的信念，昭然可見；與上文所述之「忠愛感」的心理動因正好呼應。

2、源於「恩義感」

君臣所以結合的條件，大體有二：其一指「恩」，即禮遇愛好之情，其二指「義」，名分制度之理。基於這二項要件，所構成的行為價值判斷，就是「恩義感」。⁶⁸在朱祖謀

⁶² 同註42，頁95。

⁶³ 〔明〕張綏：《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杜詩叢刊》（臺北：大通書局，1974），第2輯，卷14，頁425。

⁶⁴ 〔清〕江孟亭輯：《杜詩集說》（清乾隆戊戌年刊本）。

⁶⁵ 〔清〕金聖嘆：《唱經堂杜詩解》，《杜詩叢刊》，同註63，卷3，頁367。

⁶⁶ 〔明〕顏廷渠云：「曰每，則無時不懷矣」，見顏廷渠：《杜律意箋》，《杜詩叢刊》，同前註，第3輯，卷下，頁223。

⁶⁷ 〔清〕錢謙益云：「曰每依南斗，蓋無夕而不然也」，同註60，頁2183。

⁶⁸ 「恩義感」一詞及相關課題，學界已使用並討論，如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中篇〈中國中古時期的君臣關係〉「君臣間的恩義感」一節，頁206-210。又見〔日〕川勝義雄著，徐谷芄、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

的詞中，每每流露此一感觸。例如〈滿路花〉「寒食酬叔問和美成韻」（卷2，190），上片云：「蠟炬灰枯，漢宮尚鬪芳節」、前調「清明再和簡叔問」上片云：「泉香霏杏粥、催新火」可為例證。以下說明之。

古代每逢清明日，有「鑽燧改火」之習。其源甚早，《論語·陽貨》已見記載，何晏集解引馬融之說，更詳述了《周書·月令》中所述四季取火與用木的差別。⁶⁹之後，由天子主持「改木迎新燧」的活動，將「新火」賜給近臣，以示「惟新之恩」；臣子感之，多應制作詩或上表（狀）稱謝。唐代闕名《輦下歲時記》：「清明日取榆柳之火以賜近臣，順陽氣也」、⁷⁰白居易〈謝清明日賜新火狀〉可證。⁷¹這顯示「賜火」，是本諸特定政教理念下，所規制的節日活動，專行於君臣之間。照例本於清明賜火，若提前於「寒食」舉行，則格外表示君恩浩蕩。如韓翃〈寒食〉末二句「日暮漢宮傳蠟燭，青煙散入五侯家」，⁷²宋代阮一閔《詩話總龜》引《丹陽集》，釋此二句便已曰：「不待清明而已傳新火，何耶」、「是時店舍已無煙，而宮中然（燃）燭乃一時之權宜耳」。⁷³故今人據此，對韓翃之詩的用意，做出別解，以為應在於「寫出承平景象」⁷⁴與「沾沐皇恩」。⁷⁵據此，如武元衡〈寒食謝賜新火及春衣表〉、⁷⁶竇叔向〈寒食日恩賜火〉等唐人詩文中所述寒食賜火，⁷⁷俱見君恩特意。

回到朱祖謀〈滿路花〉「寒食酬叔問和美成韻」，全文如下：

寒餘北嶠風，晴壓東關雪。睡鳧香四汎、鄰煙絕。青門憶否，十里絲楊折。玉
牋連夢闊。蠟炬灰枯，漢宮尚鬪芳節。閒愁天與，杜宇聲聲血。和春催去棹、
滄波接。危闌拍徧，纔信哀歌切。中坐絃能說。說行路難，為君刻意傷別。

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第二編第五章「門生故吏關係」，頁213-217。然這類論述，偏重中古時期因「私人關係」而建立起來的「君臣恩義感」。與本文所偏重由帝王恩賜近臣的「習俗或制度」所發展起來的「君臣恩義感」，關注層面不同。

⁶⁹ 《論語·陽貨》：「宰我問：『三年之喪……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三國魏〕何晏集解：「馬曰：《周書·月令》有更火之文。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季夏取桑柘之火，秋取柞櫟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一年之中，鑽火各異木，故曰改火也」，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1993），卷17，頁157。

⁷⁰ 上引文句，〔明〕陳增：《日涉編》，同註10，第11冊，卷3，頁366，「清明」條下。〔清〕蕭智漢：《新增月日紀古》，同前註，第21冊，卷3上，頁922，「清明」條下，二書俱作《輦下歲時記》所載。然覆校今本《輦下歲時記》未見。

⁷¹ 〔清〕董誥等編，孫映達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第5冊，卷668，頁4013。

⁷² 同註18，第8冊，卷245，頁2757。

⁷³ 〔宋〕阮一閔：《詩話總龜前後集》（臺北：廣文書局，1973），第4冊，後集卷26，頁1346-1347。

⁷⁴ 俞陛雲：《詩境淺說》（北京：中華書局，2010），頁188。

⁷⁵ 李定廣：〈韓翃〈寒食〉詩正解〉，《中國韻文學刊》第2期（2004），頁41。

⁷⁶ 同註71，第4冊，卷531，頁3187。

⁷⁷ 同註18，第10冊，卷271，頁3028。

詞作於光緒三十三年，和周邦彥〈滿路花〉「咏雪」（金花落燼燈）詞韻。⁷⁸周詞以「雪夜」、「春後絮」營造一片白茫茫的意象，抒發與情人分別後，心中紛亂無窮的離愁。朱詞雖亦由渾白的情景起興，然所咏之物、所抒之情，與周詞不盡相同。上片可見詞人於春寒微弱，梨花如雪盛放，炊煙盡絕的寒食節裏，擁香夜思，「青門憶否，十里絲楊折」二句，懷想當日遠別朝廷，政治道路難行，點滴心頭，故對李白受讒去京而創作的〈行路難〉產生共鳴。⁷⁹此情唯知音叔問可訴，所以曰「為君刻意傷別」。詞人念茲在茲，盡是君臣相待之道，因此假節日故事以發揮，其言曰：「蠟炬灰枯，漢宮尚鬪芳節」，可意指今日恩賜新火之事雖不行，然猶有舊事可供回味。實則追思古代帝王恩賜近臣的承平時代，與「催新火」一語，俱見企慕的情意。

除此之外，他於前引〈六醜〉「滬上元夕，和夢窗吳門元夕風雨韻」云：「記起傳柑事、情味別」、〈戚氏〉「丁巳滬上元夕」：「年時笑語傳柑，醉沾鎬宴」，所追思之事，亦多君恩之感。據陳元靚《歲時廣記》所載，正月十五夜，有貴戚以黃柑相遺贈之俗。⁸⁰此風早有，北宋文人多敘此事，如蘇軾〈上元侍飲樓上三首呈同列〉之三曰：「歸來一盞殘燈在，猶有傳柑遺細君」，自注：「侍飲樓上，則貴戚爭以黃柑遺近臣，謂之傳柑，聽遺以歸，蓋故事也」，⁸¹東坡此詩，當為表達感念傳柑侍宴之恩而作。其他如宋代胡寅〈春日幽居示仲彥彥仲十絕〉之四：「傳柑說道昇平復」、⁸²張孝祥〈鷓鴣天〉「上元啟（設）醺」下片結云：「何人曾侍傳柑燕（宴），翡翠簾開識聖顏」、⁸³劉應雄〈木蘭花慢〉「元夕郡侯邀賦」：「傳柑記陪佳宴」。⁸⁴此外，又如明代彭孫貽《茗齋集·佛手柑》之二：「閩粵霜黃入貢遲，賜來元夕近臣知」等追述傳柑之事的詩詞，⁸⁵俱見「承平」與「君恩」之感。回到朱祖謀的詞，所謂「笑語傳柑」顯見承自上述言說記寫「傳柑」的感恩傳統。

「鎬宴」語出《詩經·小雅·魚藻之什·魚藻》：「王在在鎬，豈樂飲酒」，鄭箋：「豈，亦樂也。天下平安，萬物得其性。武王何所處乎？處於鎬京。樂八音之樂，與群臣飲酒而

⁷⁸ [宋]周邦彥著，孫虹校注，薛瑞生訂補：《清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頁262。

⁷⁹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臺北：華正書局，1979），上冊，頁189-193。

⁸⁰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同註10，（光緒歸安陸氏刊十萬卷樓叢書本），卷11，頁8，「傳黃柑」一條。另可見[清]王士禛、張英等奉勅撰：《淵鑑類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卷17，歲時部六，「正月十五日三傳柑」條下引《歲時記》，頁392。

⁸¹ [宋]蘇軾著，[清]王文誥集訂：《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臺北：學生書局，1967），第6冊，卷36，頁3260。

⁸² [宋]胡寅：《斐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1970），初集集部別集289，第1冊，卷4，頁40。

⁸³ [宋]張孝祥撰，宛敏灝校點：《張孝祥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0），卷2，頁43。

⁸⁴ 同註44，第5冊，頁3552。

⁸⁵ [清]彭孫貽：《茗齋集》，《四部叢刊》廣編48，同註20，第2冊，卷19，〈茗齋百花詩附錄〉，頁830。

已」，⁸⁶故後來文人追述此事之作，亦多歌頌承平、君恩之意。如唐代岑羲〈奉和春日幸望春宮應制〉云：「一奉恩榮同鎬宴」、⁸⁷李適〈帝幸興慶池戲競渡應制〉：「橫汾宴鎬歡無極，歌舞年年聖壽杯」等。⁸⁸據此，可知朱祖謀詞中所謂「醉沾鎬宴」，亦承此傳統，表達了類近的感受。

在朱祖謀詞中所表露的「恩義感」不僅存在於君王與近臣的互動，同時也見於君王與百姓的互動之中。君王於節日中，參與慶典活動，乃是為了表達「與民同樂」之心，不為一己感官私樂。如前述元宵節「天子御樓觀燈」，宋代范鎮《東齋記事》卷一云：「正月十四日，上（仁宗）御樓遣中使傳宣從官曰：『朕非好遊觀，蓋與萬民同樂』」，⁸⁹《大宋宣和遺事》亦記載了徽宗榜書：「宣和綵山，與民同樂」。⁹⁰文人感此，也吟詠歌頌，如無名氏〈鷓鴣天〉「上元詞」（日暮迎祥對御回）下片云：「奏舜樂，進堯杯。傳宣車馬上天街。君王喜與民同樂，八面三呼震地來」。⁹¹據此，前述朱氏詞中所記元夕「帝里」觀燈之事，亦涵有這類因「君王與民同樂」而來的恩義感。

此外，中國古代社會以農業為主，「節日」標示了天候節氣的循環與變化，係百姓推展農務的依據。君王於特定節日，舉行儀式，獎勸督責人民勤於農事，這正是承平盛世的指標之一。如漢代桓寬《鹽鐵論·授時》云：「發春而後，懸青幡而策土牛，殆非明主勸耕稼之意，而春令之所謂也」，⁹²雖為責備百官敷衍儀式而發，然亦指出於立春之時，「明主」需採行「懸青幡」、「策土牛」等儀式以彰明「勸耕稼之意」，《後漢書·禮儀志》亦云：「立春之日，夜漏未盡五刻，京師百官皆衣青衣，郡國縣道官下至斗食令史皆服青幘，立青幡（按：以青旗為之的春幡），施土牛耕人於門外，以示兆民，至立夏」。⁹³於是，當風調雨順，則「明主」必感謝天恩，與民共樂天時，並行恩賜。臣民獲賜，亦必回敬恩謝，以彰君德。歷代詩歌，多見例證。如清代乾隆《御製詩集》四集卷八十四〈壬寅春帖子〉：「綵勝凝和鬯，青幡萃芷繁」、「被田三白濯，心慶兆農祥」、⁹⁴宋代強至《祠部集》卷十二七絕〈謝春旛〉云：「曉策羸驂趨謝恩，君王昨夜賜春旛」等。⁹⁵

⁸⁶ 〔漢〕毛亨傳，鄭玄箋，孔穎達疏：《毛詩注疏》，同註 69，卷 15，頁 499。

⁸⁷ 同註 18，卷 93，第 3 冊，頁 1005。

⁸⁸ 同前註，卷 70，頁 777-778。

⁸⁹ 〔宋〕范鎮著，汝沛點校：《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0），卷 1，頁 11。

⁹⁰ 〔宋〕無名氏著，〔明〕王洛川校正重刊：《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第 2 冊，亨集，頁 37。

⁹¹ 同註 44，第 5 冊，頁 3668。

⁹² 〔漢〕桓寬：《鹽鐵論》（臺北：中華書局，1985），卷 6，頁 14-15。

⁹³ 〔南朝宋〕范曄著，〔南朝梁〕劉昭補志，〔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臺北：中華書局，1984），卷 14，〈禮儀志〉，禮儀上，頁 1。

⁹⁴ 〔清〕乾隆著，蔣溥奉勅編：《御製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同註 19，集部別集 1308，頁 660。

⁹⁵ 〔宋〕強至：《祠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1975）別輯，集部別集，第 2 冊，卷 12，頁 15。

承上，朱祖謀詞中，述及元日的節令，亦見相關的追想與感念。如前引〈燭影搖紅〉「乙丑元日和閨枝」下片結曰：「為誰消息，爆竹東鄰，青旛孤顫」，「孤」字語意悲慨，正因為往昔君臣恩義相感的傳統已不復存在，如今迎春，徒具形式。

綜合上述二類心理動因，則朱氏這類「節日詞」的書寫，彰明了如下重要的意義：君以仁恩待臣，臣以忠心報君，這就是國家得以承平久安的基礎。此一恩澤的施行，雖因君王與臣民之間親疏關係的等差，而有不同的作為，然既依循天時與人倫的規度，是為合理之情，公義在焉。因此，朱祖謀於「節日詞」中對那些循私亂紀的君恩，表達批判之意。對文人於節日中，徒然追憶、感慨兒女私情，要表不滿。如前引〈高山流水〉「七夕用夢窗韻」下片云：「人天事，輕賺羅池倦客，酒醒清鍾。下疏簾憶斷，釵盒故情慵」。「輕賺」二字可見對吳文英因兒女私情而傷倦不予認同。

此一節日書寫，背後所持君臣恩義相感的理念，應源出於儒家政治理想，而與戰國以來，於游俠的行為中，所體現的恩報較遠。蓋這類行為偏重私人知遇恩受的意義。另外，民國元年（1912），陳煥章等人創立孔教會，朱祖謀曾參與助成。此可見陳煥章〈孔教會序〉所述。⁹⁶則此一維護孔教的立場，正可以呼應上說。以下對朱氏的「尊君」思想所可能依據的儒家學說，予以探討。

三、朱祖謀「節日詞」的尊君意識及其在近代中國的政治、文化意義

（一）朱祖謀「節日詞」的「君恩感」可能依托的儒家「尊君」理念

由上一節的論述中，可見朱祖謀的「節日詞」中對於「君恩」和「君威」頗為看重。如〈六醜〉：「記起傳柑事」、〈滿路花〉：「漢宮尚鬪芳節」、前調：「泉香霏杏粥、催新火」、〈戚氏〉：「年時笑語傳柑，醉沾鎬宴」、〈燭影搖紅〉：「仙仗簇朝正，瞻座香飄殿」、〈齊天樂〉：「茱萸舊賜」等等。其背後透顯的政治理念之一是：君主依「時」賞賜，承天治人，故其位可尊。早在隋代，「性儒素（儒者之質），每以雅道自居」的杜臺卿，⁹⁷所撰《玉燭寶典》，序文便云：「王者上奉天時，下布政於十二月」，而於體例上，將《禮記·月令》經文，分置諸月，「冠篇首」，便已涵有溯源節令活動之由來於《禮記·月令》的意味。⁹⁸由此可以合理推想，致力於維護孔教的朱祖謀，所填「節日詞」依據的政治理念應可能溯源《禮記》中的〈月令〉、〈禮運〉等篇。

⁹⁶ 〔清〕陳煥章：《孔教論》（上海：孔教會，1913年），頁96。

⁹⁷ 〔唐〕魏徵、長孫無忌等奉敕撰：《隋書》（臺北：中華書局，1971），〈杜臺卿傳〉，卷58，頁4。

⁹⁸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序》，同註10，頁1-2。

《禮記》收錄了孔子弟子，及戰國以來儒者的論見，其中〈月令〉或稱〈明堂月令〉一篇，鄭玄注調呂不韋集賓客所成的《呂氏春秋》，其中〈十二月紀〉即其前身。⁹⁹該篇由「順應天時」（即「月」之意）論述君王如何施行政事（即「令」之意），與〈王制〉篇並行互補，是儒家為後代君主所規劃的理想施政綱領。此說現今學界已經詳述，不再贅言。

100

考察〈月令〉，於立春之月，曰：「立春之日，天子親帥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以迎春於東郊。還反，賞公卿大夫於朝。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毋有不當」。¹⁰¹此外，於孟夏、孟秋、孟冬皆言賞賜之事，只是所賜對象不同。故孔穎達疏解在上引經文之下，綜說曰：「四時所賞不同者，庚云：順時氣也」，尤其「春，陽氣始著，仁澤之時，故順其時而賞朝臣及諸侯也」。同時還要詔令三公，將恩德遍施百姓，務期做到「使當得者皆得，得者無非其人」。¹⁰²此外，〈月令〉文中還表達了強烈維護天道綱紀的意識，如「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¹⁰³惟天子能參贊天地，故屢屢稱之「聖人」，此意可見〈禮運〉曰：「聖人參於天地，並於鬼神，以治政也」、「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為本，以陰陽為端，以四時為柄」，而以「君者立於無過之地也」，¹⁰⁴尊之固宜。

朱祖謀於《彊邨棄稿·癸丑坡公生日集巢隱齋用集中韻》一詩曾云：「新法亂天紀」、¹⁰⁵〈權制〉一詩又云：「澤龍吐其珠，問誰能不含」，¹⁰⁶皆已表露對「亂紀」與「君權」旁落的不安。雖然書名「棄稿」有「詩不足存也」、「雅不欲以詩傳」的用意。¹⁰⁷然而，書中詩作，既經「刪汰幾半」而仍留存者，可見這類思想，始終為朱氏所固持，而與上述《禮記》思想可以呼應。據此，亦可推知他的節日詞中，所以特別凸出節令恩賜之事，其思想的本源，即可能來自〈月令〉。

此外，前述已指出，朱祖謀的「節日詞」具有君臣恩義相感，仁忠相待的理念。此即君必「仁」，臣乃「忠」。臣之所以盡「忠」，係因君以「仁」相待。其依據亦可見諸《禮記·禮運》，其文曰：「何謂人義？父慈，子孝，兄良，弟弟，夫義，婦聽，長惠，幼順，君仁，臣忠」，¹⁰⁸此十義另呈兩兩為對的關係。而以父慈子孝為首。君臣之間正是透過「恩

⁹⁹ 〔漢〕鄭元（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同註 69，卷 14，頁 278。

¹⁰⁰ 王夢鷗：《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頁 274。

¹⁰¹ 同註 99，頁 286。

¹⁰² 同前註。

¹⁰³ 同前註，頁 289。

¹⁰⁴ 同前註，頁 430、435。

¹⁰⁵ 〔清〕朱祖謀，《彊邨棄稿》，同註 1，頁 8391。

¹⁰⁶ 同前註，頁 8379。

¹⁰⁷ 龍沐勳《彊邨棄稿跋》：「右《彊邨棄稿》一卷，為先生晚年手定詩集。……於詩原有《玉湖跌館詩存》，刪汰幾半。國變後，所作尤少。題曰：『棄稿』，意謂詩不足存也。先生雅不欲以詩傳，而世之誦先生詞者，莫不以一讀其詩為快」，同前註，頁 8399。

¹⁰⁸ 同註 99，頁 431。

義」，營造出擬父子的關係，這種「家國一體」的觀念，〈禮運〉言之甚著，其言曰：「聖人耐以天下一家，以中國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於其義，明於其利，達於其患，然後能為之」。¹⁰⁹故以君之尊，興天下公利，除天下公害，與黃宗羲〈原君〉一文所批判的「後之為人君者不然。以為天下利害之權皆出於我，我以天下之利盡歸於己，以天下之害盡歸於人」、「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不可類比。¹¹⁰又前述朱祖謀〈鷓鴣天〉「辛未長至口占」所述「忠孝」之義，正可與上述《禮記·禮運》「家國一體」的思想相呼應。

此外，前述「節日詞」中所涵有「與民同樂」的思想，可見《孟子·梁惠王下》：「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¹¹¹即孟子已經揭示君王的仁政，就表現在與人民的生養休息同一律動。此意也已見歷代儒者的闡釋，如朱熹集注曰：「與民同樂者，推好樂之心以行仁政，使民各得其所」，¹¹²而可能為朱祖謀所繼承。

本文並非認定朱祖謀的「尊君意識」所可能依據的文化思想，僅限於上述所列舉的少數儒家經典篇章。而係因「節日詞」的主題，作如上方便的詮釋，意在指明朱氏的「尊君」思想不一定只為清朝某一特定帝王所發，而是另外帶有向傳統文化找尋理想君主的意圖。因此，即使政權猶存，然倘若喪失此一政治理想，勢同亡國。前述引〈六醜〉「滬上元夕，和夢窗吳門元夕風雨韻」一詞，作於光緒三十四年（1908），彼時清廷尚未覆亡，然詞人卻有「清鉛暗結」之恨，何也？可能的原因之一，蓋當時正推動立憲，其背後所根據的文化理念，卻未必來自朱氏所認同之儒家「尊君」的理念。據此，可以進一步闡釋朱氏「節日詞」所可能對治的時代政治問題。

（二）朱祖謀「節日詞」的「尊君意識」在近代中國的政治、文化作用

本文探討的「節日詞」所撰成的年代，集中在光緒三十三年丁未（1907）到民國二十年辛未（1931），若從中國近代政治演進的歷程來看，這段時期也正是由君主立憲向民主共和發展的關鍵時刻。

其中，晚清之際，「立憲」之說頗為流行，朱祖謀於光緒末到宣統年間所撰寫的「節日詞」，於「君恩」多所著墨。如前引〈滿路花〉：「漢宮尚鬪芳節」、前調：「泉香霏杏粥、催新火」、〈六醜〉：「記起傳柑事」等，則這類詞作相應於上述的時代氛圍而言，所以流露

¹⁰⁹ 同前註。另現今學者已對漢代君臣關係「擬父子化」予以探討，如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同註68，頁210-222，「君臣關係的『父子化』」一節，可資參考。

¹¹⁰ 〔明〕黃宗羲著，李廣柏注譯：《新譯明夷待訪錄》（臺北：三民書局，1995），頁3。

¹¹¹ 〔戰國〕孟子著，趙歧注，孫奭疏：《孟子注疏》，同註69，卷2上，頁29。

¹¹²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卷2，頁214。

「尊君」之感，可能涵有感發時人思考當時「君主立憲」所以「尊君」的情感基礎與文化理據。其他如〈戚氏〉：「年時笑語傳柑，醉沾鎬宴」、〈燭影搖紅〉：「仙杖簇朝正，瞻座香飄殿」等等，雖亦流露「君恩」、「君威」之感，然撰作之時已屬民國建立，清室告退之後，雖不乏尊君之意，而其作用與前時相較應有差別。以下，先就其「節日詞」所可能對應之「君主立憲」的時代議題及意義，予以論述。

雖然朱祖謀於詩中曾對「新法亂紀」表達不滿，此「新法」所指為何？詩裏並未指明。不過龍沐勛〈彊村（邨）本事詞〉於〈念奴嬌〉「同理臣、半塘觀荷葦灣，用白石韻」下述本事曰：「先生於葦灣遇南海康有為，方與人大談新政，面有得色。詞蓋有感於斯事而作」，¹¹³此詞作於光緒二十三年丁酉（1897），¹¹⁴明年戊戌變法。白敦仁據此指出「彊村亦主變革，但於康氏之沾沾自喜似有不滿」，見〈水龍吟〉「四印齋賦白芍藥，分得肯字」箋注（卷1，13）。若此說為確，彼時（1897）康有為開始主張立憲，其言曰：「自馬江役後，累詣闕上書，請大變法。及丁酉膠變，數上疏陳，首言立憲」。¹¹⁵則朱祖謀似乎不完全認可康梁等人立憲新政的主張。

到了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清廷下詔預備立憲。光緒三十四年戊申（1908），公布國會召集辦法，以九年為期。浙江、江蘇等士紳，紛紛響應立憲。早在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就開始宣傳「君主立憲」的湯壽潛（原名震，1856-1917），趁此風潮，敦促朝廷召開國會，落實君王立憲。並於光緒三十四年，擬稿〈國會請願書〉，後由歸安朱祖謀署名領銜上書。¹¹⁶在《彊村語業》中有〈洞仙歌〉「丁未九日」（卷2，195-196），舊刻題下有「寄懷蟄先杭州」。「丁未」係光緒三十三年（1907），「蟄先」即湯壽潛的字，可見二人交誼。若上述〈請願書〉真的出於朱氏首肯，那麼此時，他已能認同君主立憲的主張。然何以他接受時人的敦請，表態支持湯壽潛等人所倡導的立憲；卻未必認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的理念呢？

此外，當時與君主立憲說相對者，乃是革命思想。在此一思潮下，為了掃除皇權，建立民主，也曾向傳統文化尋求理據。由此看來，朱祖謀的「尊君意識」，一方面可能對治若干主張君主立憲說的文人，其背後引為根據的中西方學說；另一方面則可能指向革命

¹¹³ 同註9，頁76。按：此詞見《彊村詞牘》卷1收錄，不見《語業》。

¹¹⁴ 〈念奴嬌〉一詞繫年，參馬興榮：〈朱孝臧年譜〉（上），《詞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3），第14輯，頁357。

¹¹⁵ 康有為：〈布告百七十餘埠會眾丁未新年元旦舉大慶典告歲，保皇會改為國民憲政會文〉，見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上冊，頁597。

¹¹⁶ 湯壽潛：〈代擬浙人國會請願書〉，見杭州文史研究會、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浙江圖書館編：《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輯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第3冊，頁15-17。朱祖謀領銜上書的記載，見上海申報館編：《申報》（上海：上海書局，1983），大清光緒34年七月初五（西曆1908年8月1日）第1張第5版，「國會問題」項下，頁429，其曰：「湯蟄仙京卿預告不承認選為代表，惟請願書領銜者，同人公推王□石相國，現因病力辭，已改舉湖州朱古微」。

黨人，其所援引的「輕君」傳統，而涵有正其說的作用。以下從這兩方面，闡釋朱祖謀「尊君」的時代意義。

為鼓吹君主立憲，聚集四方力量共起勤王，光緒二十五年己亥（1899），康有為於加拿大成立保皇會。「保皇」足見尊君，特尊光緒皇帝。為使一己的政治作為，能取得理論上的根據，康有為尊《春秋公羊傳》，宣稱此書「為孔子改制之說在也」、「孔子所以為聖人，以其改制」，¹¹⁷並對漢儒以來所崇敬的古文經書，予以強烈的批判，凡經義可見固守綱紀，述而不作，對變革不利者，即駁斥為偽，最具體的論著就是《新學偽經考》。〈明堂月令〉正是其中之一。¹¹⁸其言曰：「自劉歆偽古文以亂今文」、「《禮》則增〈月令〉、〈明堂位〉、〈制法〉三篇，皆漢儒所撰」。¹¹⁹他對《公羊傳》的釋義，乃是宣揚由「君主制」、經「立憲」，終而「民主共和」的三世進化史觀。¹²⁰與他所倡導的「民貴君輕」思想，¹²¹二者皆頗見西方「進化論」、「民約論」的理路。若由傳統士大夫的觀點來說，這類創造性的詮釋，較偏向「師夷」、以「夏」事「夷」一面。故當時就有人批評康有為、梁啟超「用夷變夏」、¹²²「又作《改制考》，其貌則孔也，其心則夷也」、¹²³「今之《公羊》學又非漢之《公羊》學也，漢之《公羊》學尊漢，今之《公羊》學尊夷」。¹²⁴據此，可以明白為什麼朱祖謀不認同康、梁的尊君主張，蓋循上一節所述，朱氏的儒家思想根據之一，正在於〈月令〉這類可見維護天道綱紀的古文經書篇章，在此一觀點下，可能認為康、梁的主張將使得本來用以維繫君臣關係的「恩義」俱絕。

現今學界已經指出孫中山早期的民主改革思想，係承自黃宗羲《明夷待訪錄》而來，

¹¹⁷ 〔清〕康有為：〈桂學答問〉云：「孔子所以為聖人，以其改制」、「《公羊》、《繁露》所以宜專信者，為孔子改制之說在也」。該文發表於1894年。見康有為著，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第2集，頁18。又康有為，《孔子改制考》卷8云：「孔子為改制教主，賴董生大明」、卷9云：「此《春秋》公羊家之說，所稱『王者』，即指孔子。蓋師說相傳，皆以《春秋》當新王也」。同前註，第3集，頁103、108。

¹¹⁸ 〔清〕康有為：〈新學偽經考〉藉主客對答，條陳康氏所著偽經考著作，其中之一為〈明堂月令偽證〉。見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3。

¹¹⁹ 〔清〕康有為：〈康南海先生講學記〉，同註117，第2集，頁107，「古今學術源流」題下。〈講學記〉撰成於1896年秋。

¹²⁰ 〔清〕康有為：《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1云：「亂世之法，人主總攬事權；升平之世，人主垂拱無為；太平之世，一切平等，貶及天子，無王可言。此為升平世言之，故立君民共主之治體，而稱天王也」。卷3又云：「孔子生當據亂，故先發大夫不世，而內諸侯則待以世祿不世官之義。推之升平世，則諸侯不世。太平世，則天子不世，皆當選賢為之。今歐國立憲之法，蓋用內諸侯世祿不世官之義，以待其君，亦以生當升平，一時不能去世帝，而委曲以致之，別舉賢為相，以執國政。所謂通賢共治，示不獨尊，重民之至，此真升平之法也」，同前註，第6集，頁15、57。

¹²¹ 〔清〕康有為：〈孟子微序〉云：「民貴君輕，乃孔子升平之說耳」，同前註，第5集，頁412。該文撰成於光緒27年（1901）。

¹²² 〔清〕葉德輝：〈葉吏部非幼學通議〉，見〔清〕蘇輿編，楊菁點校：《翼教叢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5），卷4，頁275。

¹²³ 〔清〕葉德輝：〈葉吏部與石醉六書〉，同前註，卷6，頁340。

¹²⁴ 〔清〕葉德輝：〈葉吏部與劉先端黃郁文兩生書〉，同前註，卷6，頁344。

尤以〈原君〉、〈原臣〉為要。¹²⁵此說依據光緒二十一年乙未（1895）署名杞憂公子所撰寫的〈原君原臣序〉，¹²⁶杞憂公子正是孫中山的化名。在這篇序文中，一承黃宗義批判君主專制與提倡「天下為主，君為客」的思想，雖然尚不致於到達廢君、去君的地步，但在黃說的基礎上，將「君臣之義」、「感君上知遇之恩」貶低為「躋乎僕妾之間」，又高舉民權，視「立君」、「設臣」皆「為民役」。

至此，「君威」縱未全失，然已十分淡薄輕賤。據此，可以明白為什麼朱祖謀的節日詞可見「尊君」、「重恩」的意識，即可能有意扭轉這類改革主張下，對於古聖賢所提出維繫國家安定的君臣之道，產生的撼動。

那麼他為什麼支持湯壽潛所主張的君主立憲呢？此可由湯氏於光緒二十七年辛丑（1901）撰成的《憲法古義》尋得線索。今日雖無法目覩全書，不能妄斷湯壽潛與朱祖謀二人思想的同異；然由該書序文可見主旨一二。如「憲法者，民權之護符，而亦君權之後盾」，¹²⁷顯見不輕視君權，與朱祖謀立場相近。然更重要的是，此序可見湯氏對中西學孰主孰從的觀點如下：

庚子亂後，救亡無術，立憲之說漸騰於時，然只知憲法為東西所已行，不知憲法為中國所固有。故臚舉東西國憲法所許之權利，一一證以中國古書，凡為卷三。使中國人民知憲法為沈淵之珠，遠遊之子，循而求之，固所自有，未始非考求憲法之一助。¹²⁸

此一觀點與朱祖謀頗為相合。蓋朱氏曾為陳煥章《孔門理財學》作跋文，其言曰：「彼所謂精新之學術，美備之法制，本為我古經所具有」，「彼」指歐美之學。據此，朱氏推許陳煥章能「博綜中外之學而觀其會通」。¹²⁹

承上，朱氏一方面緬懷人倫綱常為本的儒家政治理想，意不可輕易廢除，另一方面則支持外來的君主立憲之政體，其中應涵有體用的思考。蓋晚清以來，視「三綱五常」的

¹²⁵ 〔明〕黃宗義：〈原臣〉，同註110，頁10-17。

¹²⁶ 杞憂公子：〈原君原臣序〉，見〔明〕黃宗義著，孫中山節印：《原君原臣》，現館藏日本和歌山南方熊楠紀念館。方祖猷：〈黃宗義《明夷待訪錄》對孫中山民主思想的啟蒙〉，《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8卷第5期（2011.09），頁111，引錄該序全文，為本文所據。又〔日〕小野和子：〈孫文か南方熊楠に贈った《原君原臣》について〉（據《會報》中譯文：關於孫中山贈送給南方熊楠的《原君原臣》），《孫文研究：會報》（神戸：孫文研究會，1992）第14號，已詳考該書節印贈讀始末，可資參考。

¹²⁷ 〔清〕湯壽潛：〈憲法古義敘〉，《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輯刊》，同註116，第3冊，頁1。光緒27年（1901）8月修改稿。

¹²⁸ 同前註，頁3。

¹²⁹ 〔清〕朱祖謀：〈孔門理財學書後〉，同註96，頁90。

「恭順倫理」為「聖之經」、「不易之體」，而以西器為用的體用觀，在傳統文人之間頗為流行；甚且有「『西器』本出於中國，因而不必『顯立』中西『異同』，也不須一概加以排斥」，如鄭觀應、陳熾、湯震（壽潛）俱有此見。¹³⁰朱祖謀的尊君意識，與這類觀點合流。然這類觀點較顯「道」、「理」的教訓，而朱氏則顯「恩情」的感發，二者之間的作用或可再作析分。

清室告退，民國共和代起，「君主立憲」風潮已遠。朱祖謀的「節日詞」仍可見「君恩」之感。其意義可能由「政體」的支持轉向保存、弘揚漢族傳統政治良善文化，以回應西方文明，藉此思考、確立「遺民」的存在意義。他曾於〈望江南〉「雜題我朝諸名家詞集後」二十六調之一，凸出屈大均的詞作成就。其詞曰：「湘真老，斷代殿朱明。不信明珠生海嶠，江南哀怨總難平。愁絕庾蘭成」（屈翁山）（卷3，326）這組詞撰作年代為民國十四年。屈大均在《翁山文鈔·書逸民傳後》曾辯明遺老不與國俱亡的用心，在於「存古帝王相傳之天下於無窮也」，¹³¹此一理念即與朱祖謀合拍。故朱氏特別心許屈大均。由此可推想，前述「仁忠相待」、「恩義相感」的儒家政治理念，應是朱氏這些遺老，亟欲保存的漢族政治理想之一。

本文雖為朱祖謀「節日詞」的書寫行為，所可能涵有的政教理想，予以闡釋；但不意味完全同意朱氏的立場。而是基於評價歷史之前，本應先有同情性理解的學術要求。固然，朱氏的政治思想，可能有保守的一面，然而他所信守之「恩義相感」、「仁忠相待」的傳統君臣理念，對於中國政治的現代化來說，是否全無啟示的價值呢？其功過如何，或許是另一個可以再省思的課題。

四、結論

本文認為現今學界對中國近現代政治思想沿革的討論，多取政論性文章為依據，少見由彼時文官的詩詞創作，去闡發他們如何透過「感發」的形式，達到喚起其他眾多文人，對漢族傳統固有政治良善的記憶與共識。在此一學術史的省思之下，形成本文的論題。

為了達到上述的目的，本文特取晚清民初在政壇及文壇皆享有盛譽的朱祖謀為研究對象，針對他於光緒三十三年到民國二十年之間填寫「節日詞」中所追想的盛世，以及所表露的尊君意識，探討背後所根源的儒家政治理想。重要結論如下：

¹³⁰ 關於這部分的論述，可參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定意識型態的西化理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頁106-111。

¹³¹ 〔清〕屈大均著，歐初、王貴枕主編：《屈大均全集·翁山文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卷8，頁394。

（一）朱祖謀的「節日詞」對「盛世」的追想與表述，筆法有二：其一聯想共情同感的古人，以抒發「傷愁」的過節心境，藉以起興；其二則追想歷史上帝京、帝王的節日活動，意涉褒貶。這是一種以公眾群體共享的文化傳統為基礎，進而指向社會群體，意在進行社會感化的創作行為。

（二）朱祖謀「節日詞」所以如此追想「盛世」，其內在的心理動因有二，其一源於「忠愛感」，其二源於「恩義感」，二者一涉臣道，一涉君道，相待而生。與朱氏自述「忠孝」的理念以及維護孔教的立場，正好呼應。

（三）朱祖謀的「節日詞」，頗為看重「君恩」和「君威」，由此可見他的「尊君」意識。因藉節日恩賜的故事，以資感發，由此可以推求，他所根據的文化思想基礎，主要來自於《禮記·月令》、《禮記·禮運》、《孟子·梁惠王》諸篇重視「君王」的地位以及「與民同樂」的儒家政治理念。

（四）朱祖謀的「尊君意識」，一方面與康有為、梁啟超等人持西方進化、民權思想對《春秋公羊傳》的三世說，予以創造性詮釋，而提出的君主立憲觀念不完全相合。因為在這種觀念下，〈月令〉篇所表述維護天道綱紀的思想，不利於孔子改制說，而受到偽說的批判。二方面與孫中山等革命黨人援引黃宗羲《明夷待訪錄》之〈原君〉〈原臣〉的理念不合。因為這類言論下，視君臣恩遇為僕妾之道，鄙薄君威於輕賤。三方面與晚清湯壽潛等人所主張的君主立憲，立場較為一致。蓋這類論述的理念強調「西器本出於中國」、以「綱常」為體、「西器」為用的「體用觀」與朱祖謀言說的立場較為近合。不過他人所表述的方式，偏向道理的教訓，朱氏的方式，偏向恩情的感發，二者作用不同。基此，朱祖謀的節日書寫及其對君主立憲的支持，所表現出來的中體西用觀，型態頗為特殊，又在近代中國所可能發揮的政治、文化作用，皆值得深入探究。

附錄：《彊村語業》中的「節日詞」

撰成年代	詞牌	詞題	《語業》 卷數，頁數	簡要紀事，據馬 興榮《朱孝臧年 譜》（上）（下）
光緒 24 年 （1898）	鷓鴣天	九日豐宜門外過裴村別業	卷 1，16	戊戌維新 在京
光緒 26 年 （1900）	鷓鴣天	庚子歲除	卷 1，73	上疏議拳亂
	高陽臺	除夕和韻	卷 1，73	

光緒 27 年 (1901)	燭影搖紅	上巳同半塘、南禪登江亭	卷 1, 80	擢禮部侍郎，尋 兼署吏部侍郎
	花犯	辛丑除夜	卷 1, 94	
光緒 28 年 (1902)	花心動	(舊刻)花朝	卷 1, 97	簡放廣東學政
	宴清都	壬寅小除夕，陽山舟中	卷 1, 110	
光緒 29 年 (1903)	訴衷腸二 調之一	癸卯七夕和夢窗	卷 1, 118	抵廣東
	前調之二	又和	卷 1, 119	
	喜遷鶯	羅江舟夜歲除，和夢窗	卷 1, 128	
光緒 30 年 (1904)	六醜	甲辰元夕，舟泊端州，郭 外水燈喧闐，嗑然其為春 矣	卷 1, 129	
	摸魚子	清明雨夜，泊英德，寄弟 閨生	卷 1, 146-147	
光緒 31 年 (1905)	月華清	乙巳中秋和西耘	卷 1, 163	以修墓乞假離 學政，明年以病 乞解職，卜居吳 門。而後應聘江 蘇法政學堂。
光緒 33 年 (1907)	掃花遊	花朝微雪和夢窗	卷 2, 187	卜居吳城小市 橋東聽風園
	滿路花二 調之一	寒食酬叔問和美成韻	卷 2, 190	
	前調之二	清明再和簡叔問	卷 2, 191	
	洞仙歌	丁未九日	卷 2, 195-196	
光緒 34 年 (1908)	點絳脣	試燈夜微雪，和夢窗	卷 2, 210	
	六醜	滬上元夕，和夢窗吳門元 夕風雨韻	卷 2, 212	
	小重山	戊申中秋作	卷 2, 223	
	龍山會	重九汎舟斟酌橋有憶和夢 窗	卷 2, 224	
宣統元年 (1909)	華胥引	重午感舊	卷 2, 230	特詔徵召，未赴
	高山流水	七夕用夢窗韻	卷 2, 232-233	
	雨霖鈴	清明過何笛帆乘騶橋故居	卷 2, 238	

民國 4 年 (1915)	夜飛鵲	乙卯中秋	卷 2, 271-272	
	霜花腴	九日哈氏園	卷 2, 273	
民國 6 年 (1917)	戚氏	丁巳滬上元夕	卷 2, 278-279	張勳復辟失敗 《彊邨叢書》刻
民國 7 年 (1918)	紫萸香慢	焦山九日同病山、仁先、 惺仲	卷 2, 285-286	
民國 14 年 (1925)	燭影搖紅	乙丑元旦和閨枝	卷 3, 311	謁天津行在
	齊天樂	乙丑九日庸庵招集江樓	卷 3, 388-389	
	高陽臺	除夕閨生宅守歲	卷 3, 390	
民國 15 年 (1926)	定風波	丙寅九日	卷 3, 392-393	
民國 18 年 (1929)	隔溪梅令	己巳元日，賦示詰禪	卷 3, 403	主持總纂《清詞 鈔》
民國 19 年 (1930)	東坡引	庚午歲除	卷 3, 414	
民國 20 年 (1931)	浣溪沙	元夕枕上作	卷 3, 416	主滬社 遺稿託付龍榆 生 病逝
	三姝媚	寒食梵王渡園作	卷 3, 418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何晏集解，〔宋〕邢昺疏：《論語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1993年。
- 〔戰國〕孟子著，趙岐注，孫奭疏：《孟子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1993年。
- 〔戰國〕莊周著，〔清〕郭慶藩編，王孝魚整理：《莊子集釋》，臺北：三民書局，1993年。
- 〔漢〕鄭元（鄭玄）注，〔唐〕孔穎達疏：《禮記注疏》，臺北：藝文印書館《十三經注疏》，1993年。
- 〔漢〕桓寬：《鹽鐵論》，臺北：中華書局，1985年。
- 〔漢〕王充著，袁華忠、方家常譯注：《論衡》，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1997年。
- 〔魏〕王粲著，吳雲、唐紹忠校注：《王粲集校注》，收錄於吳雲主編：《建安七子集校注（修訂版）》，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5年。
- 〔南朝齊〕沈約：《宋書》，臺北：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四部備要》，1982年。
- 〔南朝宋〕范曄著，〔南朝梁〕劉昭補志，〔唐〕章懷太子注：《後漢書》，臺北：中華書局，1984年。
- 〔南朝宋〕劉義慶著，〔南朝梁〕劉孝標注，楊勇校箋：《世說新語校箋》，臺北：正文書局有限公司，1988年。
- 〔南朝梁〕宗懔著，杜公瞻注，王毓榮校訂：《荊楚歲時記》，臺北：文津出版社，1988年。
- 〔南朝梁〕吳均：《續齊諧記》，臺北：藝文印書館《百部叢書集成·古今逸史》，1966年。
- 〔隋〕杜臺卿：《玉燭寶典》，臺北：藝文印書館《歲時習俗資料彙編》，1970年。
- 〔唐〕魏徵、長孫無忌等奉敕撰：《隋書》，臺北：中華書局，1971年。
- 〔唐〕王維著，陳鐵民譯注：《新譯王維詩文集》，臺北：三民書局，2009年。
- 〔唐〕李白著，〔清〕王琦注：《李太白全集》，臺北：華正書局，1979年。
- 〔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註》，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
- 〔唐〕韓鄂：《歲時紀麗》，臺北：藝文印書館《歲時習俗資料彙編》。
- 〔唐〕白居易著，謝思煒校注：《白居易詩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6年。
- 〔唐〕李賀著，王友勝、李德輝校注：《李賀集》，長沙：岳麓書社，2003年。
- 〔唐〕闕名：《輦下歲時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歲時習俗資料彙編》。
- 〔宋〕歐陽修：《歐陽修全集》，臺北：世界書局，1991年。
- 〔宋〕蘇軾著，朱祖謀編年，龍沐勛箋：《東坡樂府箋》，臺北：華正書局，1990年。

- ，鄒同慶、王宗堂校注：《蘇軾詞編年校註》，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 ，施元之、施宿、顧禧合註，邵長蘅、顧嗣立刪補：《注東坡先生詩》（又稱《施註蘇詩》），《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年，集部總集。
- ，王文誥集訂：《蘇文忠公詩編註集成》，臺北：學生書局，1967 年。
- 〔宋〕周邦彥著，孫虹校注，薛瑞生訂補：《清真集校注》，北京：中華書局，2002 年
- 〔宋〕胡寅：《斐然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初集集部別集 289，1970 年。
- 〔宋〕陳元靚：《歲時廣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歲時習俗資料彙編》，道光六安晁氏本活字排印學海類編本景印。
- ：《歲時廣記》，臺北：藝文印書館《歲時習俗資料彙編》，光緒歸安陸氏刊十萬卷樓叢書本。
- 〔宋〕龐元英：《文昌雜錄》，《百部叢書集成·學津討原》，臺北：藝文印書館，1965 年。
- 〔宋〕蒲積中：《歲時雜詠》，《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總集。
- 〔宋〕鮑陽居士：《復雅歌詞》，唐圭璋：《詞話叢編》，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8 年。
- 〔宋〕張孝祥著，宛敏灝校點：《張孝祥詞校箋》，北京：中華書局，2010 年。
- 〔宋〕胡仔：《苕溪漁隱叢話》，臺北：廣文書局，1967 年。
- 〔宋〕孟元老著，鄧之誠註：《東京夢華錄注》，臺北：世界書局，1988 年。
- 〔宋〕王明清：《揮塵錄·餘話》，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1981 年。
- 〔宋〕朱熹著，李光地、熊賜履奉勅編：《御纂朱子全書》，《文淵閣四庫全書》子部儒家類。
- ：《四書章句集注》，臺北：長安出版社，1991 年。
- 〔宋〕吳文英著，吳蓓箋校：《夢窗詞彙校箋釋集評》，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7 年。
- 〔宋〕張炎著，蔡桢疏證：《詞源疏證》，北京：中國書店，1985 年。
- 〔宋〕郭茂倩：《樂府詩集》，臺北：中華書局，1987 年。
- 〔宋〕阮一閔：《詩話總龜前後集》，臺北：廣文書局，1973 年。
- 〔宋〕范鎮著，汝沛點校：《東齋記事》，北京：中華書局，1980 年。
- 〔宋〕無名氏著，〔明〕王洛川校正重刊：《新刊大宋宣和遺事》，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0 年。
- 〔宋〕強至：《祠部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珍本》，別輯，集部別集，1975 年。
- 〔明〕金幼孜：《金文靖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
- 〔明〕張綖：《杜工部詩通附本義》，《杜詩叢刊》，第 2 輯，臺北：大通書局，1974 年。

- 〔明〕顏廷渠：《杜律意箋》，《杜詩叢刊》。
- 〔明〕陳堦：《日涉編》，臺北：藝文印書館《歲時習俗資料彙編》。
- 〔明〕黃宗羲著，李廣柏注譯：《新譯明夷待訪錄》，臺北：三民書局，1995年。
- ，孫中山節印：《原君原臣》，現館藏日本和歌山南方熊楠紀念館。
- 〔清〕錢謙益著，〔清〕錢曾箋注，錢仲聯標校：《錢牧齋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 〔清〕屈大均著，歐初、王貴枕主編：《屈大均全集·翁山文鈔》，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6年。
- 〔清〕金聖嘆：《唱經堂杜詩解》，《杜詩叢刊》。
- 〔清〕彭孫貽：《茗齋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廣編》48。
- 〔清〕彭定求等奉勅編著，王全點校：《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
- 〔清〕乾隆著，蔣溥奉勅編：《御製詩集》，《文淵閣四庫全書》，集部別集。
- 〔清〕王士禎、張英等奉勅撰：《淵鑑類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
- 〔清〕孫元衡：《赤嵌集》，臺北：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94年。
- 〔清〕秦蕙田：《五禮通考》，《文淵閣四庫全書》，經部禮類。
- 〔清〕董誥等編，孫映達等點校：《全唐文》，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2年。
- 〔清〕周濟著，譚獻評：《詞辨》，臺北：廣文書局，1999年。
- ：《宋四家詞選》，臺北：廣文書局，1999年。
- 〔清〕佚名：《杜詩言志》，揚州：揚州廣陵古籍刻印社，1979年。
- 〔清〕江孟亭輯：《杜詩集說》（清乾隆戊戌年刊本）。
- 〔清〕蕭智漢：《新增月日紀古》，臺北：藝文印書館《歲時習俗資料彙編》。
- 〔清〕蘇輿編，楊菁點校：《翼教叢編》，臺北：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2005年。
- 〔清〕鄭文焯著，孫克強、楊傳慶輯校：《大鶴山人詞話》，天津：南開大學出版社，2009年。
- 〔清〕朱孝臧著，夏敬觀評點：《彊村叢書附遺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 ，白敦仁箋注：《彊村語業箋注》，成都：巴蜀書社，2002年。
- 〔清〕康有為著：《新學偽經考》，北京：三聯書店，1998年。
- ，姜義華、張榮華編校：《康有為全集》，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7年。
- 〔清〕陳煥章：《孔教論》，上海：孔教會，1913年。
- 〔清〕周慶雲編，方田點校：《歷代兩浙詞人小傳》，杭州：浙江出版聯合集團、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

二、近人論著

上海申報館編：《申報》，上海：上海書局，1983年。

王夢鷗：《禮記今註今譯》，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9年。

方祖猷：〈黃宗羲《明夷待訪錄》對孫中山民主思想的啟蒙〉，《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48卷第5期，2011年。

甘懷真：《皇權、禮儀與經典詮釋：中國古代政治史研究》，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年。

李定廣：〈韓翃〈寒食〉詩正解〉，《中國韻文學刊》第2期，2004年。

杭州文史研究會、民國浙江史研究中心、浙江圖書館編：《辛亥革命杭州史料輯刊》，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2011年。

馬興榮：〈朱孝臧年譜〉（上），《詞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4輯，2003年。

馬興榮：〈朱孝臧年譜〉（下），《詞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第15輯，2003年。

俞陛雲：《詩境淺說》，北京：中華書局，2010年。

唐圭璋：《全宋詞》，臺北：文光出版社，1983年。

湯志鈞編：《康有為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葉嘉瑩：《杜甫秋興八首集說》，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逯欽立輯校：《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

龍沐勛主編：《詞學季刊》，上海：上海書店，1985年。

——：《龍榆生詞學論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

薛化元：《晚清「中體西用」思想論（1861-1900）——官定意識型態的西化理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1年。

（日）小野和子：〈孫文か南方熊楠に贈つた《原君原臣》について〉（據《會報》中譯文：關於孫中山贈送給南方熊楠的《原君原臣》，《孫文研究：會報》，神戶：孫文研究會，第14號，1992年。

（日）川勝義雄著，徐谷芑、李濟滄譯：《六朝貴族制社會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

On “Golden Age” Writing and the Consciousness of Monarchism in Chu Tsu-mou’s Festal Ci Poetry

Hou Ya-wen^{*}

Abstract

It has long been a literary tradition that poets write on festal days. Some celebrate the peace of society while others deliver their own sentiments. Most of the poems are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moods of the time and personal life. The social environment arrived at a time of dramatic changes since the late Ching Dynasty. Demands for national and political reforms became stronger and stronger. Moreover, the traditional Han culture was confronted with a dire crisis due to the invasion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Thus, some traditional senior officials expressed their thoughts about the social changes through poetry. For example, Chu Tsu-mou, (1857-1931) a former vice minister of the Ministry of Rites and of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and the leader of Ci poets in his later years, often expressed his sentiments about the country in his Ci poetry collection “*Jiang Cun Yu Ye*,” (疆村語業) especially those for festal days, in which he would frequently write about the festivals during the golden age and the greatness of wise rulers. Those Ci poems were usually written when the Ching Dynasty found itself in a state of crisis, when heated debates in society raged between Democracy and Monarchism. Hence, the political implications of Chu Tsu-mou’s writing should be highlighted. It should be observed that he prioritized the Han tradition of Monarchism while accepting and echoing the calls for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at that time, realizing the spirit of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of the age.

Chu Tsu-mou alludes to and retells stories of past rulers and their ministers related to the festal days in his Ci poems in the spirit of admiration. The yearning purposefully reminds other intellectuals of the traditional merits of the Han Monarchy. Accordingly, the study has two primary aims. Firstly, it elaborates the themes of the “Golden Age” and

^{*}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Taiwan.

“Monarchism” expressed in Chu Tsu-mou’s Festal Ci Poetry. Secondly, it shows how Chu Tsu-mou’s Festal Ci Poetry realizes the spirit of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 in the political trends of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Keywords: Chu Tsu-mou, festal days, golden age, Constitutional Monarchy, Westernized Chinese Style